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

通讯

第 10 期（总第 332 期）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2017 年 10 月 5 日

-
- ◆ 关于《灰熵学》要点简介 孙万鹏(1)
 - ◆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头雁..... 林 干(4)
 - ◆ 习近平创造性地运用中华智慧 为世界和平发展提出“中国方案” 张 毅(5)
 - ◆ 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合中国实际问题研究十大关系（题目）..... 郭书田(8)
 - ◆ 为打造国际一流的粤港澳大湾区而努力..... 丁玉华(8)
 - ◆ 创造全球新时代的“一带一路”..... 张毓琮(11)
 - ◆ 农业利用外资记事 张开平(16)
 - ◆ 农业合作的真谛是服务 张蓝水(27)
 - ◆ 中国二十四节气传承保护现状概述 王晓鸣(31)
 - ◆ 践行“两学一做”，推行简办丧事，树立时代楷模 胡兆荣(37)

关于《灰熵学》要点简介

孙万鹏

最近，有人询问《灰熵学》之“要点”，有的干脆问自认有什么突破？笔者近日读了《墨子学案自叙》：“学问不厌辨难，一面申己所学，一面仍尊人之学。一人所学，疏漏误谬，终不可免”。许多朋友建议说：如此的问题，最好简明扼要，因为“要点”拟或“突破点”，是“点”不是“面”，点到为止，让人容易“体会记忆”即可。于是笔者试论于后：

一、对传统真理论、认识论的突破尝试

笔者觉得，我们传统的“真理”理论、认识论等，都是建立在二值原则之上的。所谓二值原则是经典的语义学和逻辑的核心：任一语句或命题是真的或假的，非真即假，非假即真，不存在其它的可能性。而且二值原则的背后还隐藏着实在论假设。我们记得，在文革时期，有人就运用二值原则，将人分成造反派与保守派两类，好人坏人两种的沉痛教训。

《灰熵学》将二值原则，转变为多值原则、多值逻辑，并摒弃“排中律”，给“三元论”以重要地位，并提出了“灰学世界三”理论，发表了《第三种科学》、《第三种医学》、《第三种经济》、《第三种诗歌》等论文与著作。

二、对自然界与自然序的认识突破尝试

传统科学和哲学的基本信条是：存在=物质+精神。灰熵学认为，物质与精神之间，不能没有信息作中介。强调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过程是由信息的确定部分和不确定部分（即灰信息）共同构筑的。

世界《控制论》创始人维纳强调：信息已知是“白”的，信息未知是“黑”的，信息部分已知、部分未知是“灰”的。世界灰色系统理论创始人邓聚龙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信息完全未知的系统与信息全知的系统均极稀有，甚至可以说“一切现象是灰的”，“灰就是现象”。

笔者的灰熵学认为，“物质-信息-精神”是世界的三大支柱。今天我们需要按照自然界和自然序提供的灰信息，及时修正被几千年来科学当作绝对真理使用的基本公理。诸如“空间、时间、质量数、荷量数”等公理。信息熵可以表示信息的价值，将灰学与熵定律结合起来，大有可为，甚至会“天高任熵飞”。

三、对西方盛行的扎德模糊学突破尝试

被称为模糊学之父的美国数学家扎德（Zadeh），1965 年发表了论文《模糊集合》，这标志着一门新的数学科学——模糊学诞生。其研究的是着重外延不明确，内涵明确的对象。

应该说，模糊性已成为当代逻辑学、语言学、知识论、形而上学和法学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一个的热门话题。现已发现模糊谓词“容忍”小幅度的变化，又没有预先定义好确定的外延，往往产生“连锁悖论”，无法解释

散布在世界各国的诸如“谷堆悖论”、“王悖论”、“奎恩悖论”等等。

灰熵学，继承了邓聚龙教授提出的带信息的数——灰数，以认知信息基为依据，建立了表现、灰和、灰差、灰覆盖、构造等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首次量化研究了主体对客体的认知过程。与扎德模糊学着重“外延不明确，内涵明确”相反，着重“外延明确，内涵不明确”，且通过信息补充来解决内涵不明确的问题。2016年《五一劳动节电视公开报道》，在解决我国高铁轴承“短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打破了外国对我国技术的封锁与限制。

四、对皮亚杰心理发展阶段论突破尝试

全球闻名的教育心理学“巨匠”——让·皮亚杰（Jean Piaget），一生从事智慧活动。然而，可惜的是，他的智力理论仅在发生认识论上发挥作用，而在“人格”这种惯常心理行为表现的应用研究上，却似“懒木匠造楼房，三年未上一根梁”（见孙万鹏著：《表现学》第203-20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第2次印刷）。

20世纪50年代，皮亚杰借鉴逻辑学的运算等概念，提出个体的思维发展经历感知运动、前运算、具体运算与形式运算四个阶段，并认为形式运算是个体思维发展的最高及最终阶段，并在青少年时期已出现。

在灰熵学看来，这是一个不小的失误。研究表明：形式运算思维并不能恰当地阐述与解释成人期的思维发展状况。形式思维具有“前形式思维与后形式思维”的非唯一性，它们之间存在着质的区别。

事实上，具有灰熵学思维者更易理解，为什么现在一些刚进入大学的新生，对于大学里学习的一些知识或教授的提问，感到没有“唯一确定”的标准答案，而有些难以适应。

目前的研究业已证明：后形式思维也指一种能力，处理部分确定、部分不确定，并整合权衡“短点”与“非短点”问题的能力。处于后形式思维阶段的个体，既依赖于“短点”的逻辑规律，也依赖于“非短点”的顿悟，解决问题时更灵活、更开放，更具适应性。

五、对科学追求唯一确定性的突破尝试

笔者在年轻时，热衷于科学，对科学精神：“质疑、独立、唯一”情有独钟。后来，认真学习了经典科学牛顿力学之后，对其三定律，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牛顿把所有地上和天上物体机械运动的奥秘“和盘托出”，不仅回答了物体如何运动的问题，而且回答了物体为什么按规律运动的问题，心中升起了一种一切豁然明朗的感觉。一段时间，科学界兴起的“科学终结论”，我未以为然。

后来发现，牛顿三定律是在物体的速度远低于光速和不涉及原子或亚原子粒子的力学中，近似有效的。唯一确定性之说，是不科学的。如果一定要说“唯一”，那就像是人们在银行存款，在某“短点”时期，银行给你的利息是唯一确定的。在某些机械力学实验中，在可以包容某误差率的情况下，追求科学精神的唯一性，还算是可行的。

然而，在灰熵学看来，在科学发展的长河之中，强调科学精神的唯一性，搞不好，就会阻碍科学的发展。这一点，连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都未能幸免。爱氏于1921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后，一方面宣传自己的“光量子假说”，一方面仍强调唯一确定性，其口头禅是“上帝不玩弄骰子”。因为，赌场里掷骰子，不可能掷出唯一确定骰点的，否则，力学大师就要通吃“赌钱”了。

应该指出，爱氏获诺奖之后的30多年，与哥本哈根学派的量子论创始人玻尔等争论，一直延续到逝世。这成了全球科学界的憾事。事实证明：量子的活动轨迹不是唯一确定而是概率论的。

六、对传统矛盾普遍性理论的突破尝试

在灰熵学看来,差异不是矛盾,矛盾也不是差异,差异存在于一切事物及思维的过程中,并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不同于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矛盾的基本点。以前许多学者的思想,尤其黑格尔的差异就是矛盾的观点,影响了人类思维数百年”。实际上,正如恩格斯所说:“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只存在于危机中”。这就将矛盾的普遍性下降成了危机中的特殊规律了。而差异中的个性,就犹似“世界上没有两片树叶是完全相同的那样”。从个性的意义把握哲学,我们才能对哲学思想史上的各种哲学的价值和意义,有“小杏惜香春恰恰”的恰当认识。

灰熵学认为,要在“过往——现实——未来”的三元中,把握个性。任何一种哲学都包含着人类对“井井有条”的理想之追求,然而,在现实中的人类理想是多样化的,满足这些需要的哲学,注定是丰富的个性化。哲学一旦将人的生命本性当作自己的“根固则生长,根深则视久”的蟠木根柢时,“哲学才能获得个性化的内容和形式”。

七、对科学与历史终结论的突破尝试

大家知道,第一种科学的集大成者牛顿(Isaac Newton, 1643-1727),在18世纪英格兰人眼里,是一位神化了的人物,空前的民族英雄。亚历山大·蒲柏在为牛顿所写墓志铭中说:“自然和自然法则在黑夜中隐藏;上帝说,让牛顿去吧!于是一切都照亮。自然不得不屈从他的聪明才学,愉快地向他交出她的全部秘诀;她对数学不曾设防,因而只待向实验结果投降”。于是,全球括起了一阵“科学终结论”之风。

20世纪末,美国职业科学作家约翰·霍根出版了《科学的终结》一书,再一次括起了“科学终结论”之风。然而,科学非但没终结,反而发展更迅速了。

还值得一提的是,著名政治学者福山[美],认为现在的西方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1989年提出了西方中心论的《历史终结论》。现在看来,该到这种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了。

八、对运用多种形式实行灰熵学突破尝试

笔者自1990年开始研究灰哲学以来,现在似乎可以进入第二阶段,即灰熵学阶段了。回顾近三十年来,笔者采用了多种形式:理论专著、论文集、灰文学小说、电视小说、灰学诗歌等,共撰33部,约800万字,其中小说2部,诗歌集4部。近悉,由刘晓庆、程前、王同辉、史可、孔祥玉、王伯昭主演,斯琴高娃、刘金山友情演出,以黄岩股份合作制改革为背景的电视剧,仍有人去黄岩联系购买事宜。

正如《史记·高祖本纪》所说:“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汉书·艺文志》道:“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

备注:

- 1、孙万鹏:《孙万鹏灰学文集》1、2、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 2、孙万鹏:《孙万鹏灰熵学文集》1、2、3、4、5、6卷,正在筹备出版之中
- 3、参考文献过于庞大(此略)

(作者:浙江省农业厅原厅长,本文写于2017年8月30日)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头雁

——畅谈党的十八大以来变化

林 干

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创了中国梦的里程碑。

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国家发生了日新月异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十八届六中全会上确立习近平同志为全党的核心是众望所归、历史选择、人民期待。这些年来在习近平同志领导下，我们党办了许多许多的大事、好事、喜事，全党满意、人民满意，高度评价习近平同志为党为国家为人民所作出的丰功伟绩，永远值得我们自豪和骄傲。

听听国外一些政要、专家学者、友好人士以及媒体对中国的发展变化是如何评价的：“中国的变化大，非常了不起”、“中国是世界经济领跑者”、“中国是世界经济发动机”、“中国是世界经济发展引擎”、“中国走向进步和繁荣，不仅能够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还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为全球发展提供动力”、“中国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中国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的经验值得借鉴”。国外还高度评价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是“中国之幸，世界之福”。

习近平同志高瞻远瞩，把人民最为关心的大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以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中国梦，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老虎苍蝇一起打、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明显成效，为我们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基础。

十八大以来发生了哪些变化？

一、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1）中国在国际社会有了广泛的话语权，国际地位得到了提升，过去说话没人听，现在千方百计找上门聆听中国的声音，每年国际召开的多种会议，离不开中国方案中国主张，中国的药方灵了。（2）中国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也是世界发展机遇。未来五年中，中国进口、利用外资、对外投资、出境旅游将有极大增长，将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市场、更充实资金、更丰富产品、更宝贵的合作契机，中国经济对世界贡献率将达 30%，对亚洲贡献率将达 50%。以 2016 年中国经济增长 6.7%，而世界经济仅增长 2.4% 的状况看，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领头雁。（3）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为沿线人民造福，得到广泛认可。其中涉及 64 个国家，目前已有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和支持，开发建设正在有序进行，得到好评，一带一路将惠及 40 亿人口。巴基斯坦总理称一带一路是巴基斯坦新黎明。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有 70 个成员国家参与，得到世界认可。（4）中国实施的走出去战略，不断扩展，方兴未艾。中国投资合作遍布全球 160 个国家，大约 1700 亿美元；人民币被纳入特别提款权，成为国际货币，同美元、英镑、欧元、日元平起平坐。（5）孔子学院遍布全球。目前已在 140 个国家设立了 510 家孔子学院，学生总数近 200 万人。汉学大会在中国如期举行，全球学汉语用汉语，已成为一种新潮流，世界看好中国，学

汉语有了用武之地。在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继续前进，

二、中国实力不断增强。（1）我国 2010 年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之后马不停蹄，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现在我们的经济总量已达 11 万亿美元，经济总量占到世界的 15%。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绩，堪称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2）国强民富的战略，正在一步一步地向我们走来。长时间以来，我国年经济增长保持在 10% 左右，每年增量大致在 8000 亿美元，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7 亿人口脱了贫，为全球减贫贡献率达 90%。有人估计，中国的经济发展，使 1/5 的世界人口、1/4 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和 3/5 的中下等收入国家从中直接受益。（3）选准新的增长点，加大发展力度。发展新型特色产业，集中优势加大区域发展，扩充自贸区加大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由原有 4 个增加到现在的 7 个；加大第三产业发展，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 52.8%，有力支撑了经济增长。2016 年中国经济发展显现出十大亮点，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可谓“风景这边独好”。

三、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亿万人民大干苦干决心实现中国梦彰显中国力量。深入学好用好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维新战略，认真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自信，坚持四个意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最大限度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办大事的优势，奋力拼搏，取得优异成就。相信有了党的好政策，我们的国家一定会建设的更美好。全党全国人民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优异的成绩来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作者：农业部原外资办主任）

习近平创造性地运用中华智慧 为世界和平发展提出“中国方案”

张 毅

自从 2013 年习近平成为我党、我国、我军最高领导后，以“治国理政”新理念，在短短四年内，将积重难返的中国，通过“以纪律治党”、“以依法治国”、“以严格强军”、“以改革搞活经济”，在“振兴中华”口号下，使我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奋勇前进。长时间来，在世界经济萎靡不振下，唯有中国以中高速继续发展，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和世界的赞誉，大家都拥护党中央六中全会关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决定。习近平认为，“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于是，他高瞻远瞩，在关注中国的发展同时，也关注世界的发展，经过研究，寻找世界和平发展的方案。

他说：“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到目前为止，地球是人类唯一的赖以生存的家园，珍爱和呵护地球是人类是唯一选择。”在这个地球上，“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

在同一个地球村，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瑞士联邦大厦穹顶上刻着拉丁文铭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我们要为当代人着想，还要为子孙后代负责。”

他说：“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人心，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成长，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力量的上升远远超过战争要素的增长，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但是，“我们正处在挑战频发的世界。”“人类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但“世界经济增长需要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合。地区热点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球人民面前的严峻挑战。”所以“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

他说：“中华文明历来崇尚‘以和邦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无论中国发展到哪一步，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

他主张：“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石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

他提出：在世界“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中国将努力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构架，积极同美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同俄罗斯发展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欧洲发展和平、增长、改革、文明伙伴关系，同金砖国家发展团结合作的伙伴关系。中国将继续坚持正确义利观，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务实合作，实现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中国将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同周边国家深化互利合作，秉持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理念，同非洲国家共谋发展，推动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实现新发展。”

他说：“一带一路”的提出，“原于我对世界形势的观察和思考。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新的增长动能不断积聚，各国利益深度溶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与此同时，全球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长期累积，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全球经济增长基础不够牢固，贸易和投资低迷，经济全球化遇到波折，发展不平衡加剧。战乱和冲突、恐怖主义、难民移民大规模流动等问题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突出。”对这样全球性的问题，“仅凭单个国家的力量以独善其身，也无法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只有对接各国彼此政策，在全球更大范围内整合经济要素和发展资源，才能形成合力，促进世界和平安宁和共同发展。”

他说，这样使我想起：“公元 140 多年的中国汉代，一支从长安出发的和平使团团结一致，开始打通东方通往西方的道路，完成了‘凿空之旅’，这就是著名的张骞出使西域。中国唐宋元时期，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同时同步发展，中国、意大利、摩洛哥的旅行家……都在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留下了历史印记。15 世纪初的明代，中国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留下千古佳话。这些开拓事业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为使用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依靠的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一代又一代‘丝路人’架起了东西方合作的纽带、和平的桥梁。”

他说，我想：“古丝绸之路跨越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黄河和长江流域，跨越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的发祥地，跨越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信众的

汇集地，跨越不同国度和肤色人民的聚居地。不同文明、宗教、种族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并肩书写相互尊重的壮丽诗篇，携手绘就共同发展的美好画卷。”

他说：所以古丝绸之路是“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

积于以上认识，他说：“‘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在 2013 年提出的倡议。它的核心内容是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对接各国政策和发展战略，深化务实合作，促进协调联动发展，实现共同繁荣。”

我们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是“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

我们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是“以打造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为合作目标。”

我们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实现战略对接、优势互补。”“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我们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是“打造开放型合作平台，维护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创造有利于开放发展的环境，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

我们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要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营造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

我们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是要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

我们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要“树立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我们倡议的“一带一路”，“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更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

我们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局限中国，而是“作为迄今为止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互联共赢的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东牵亚太经济圈，西接欧洲经济圈，穿越非洲，环连亚欧，涉及 60 个国家，40 多亿人口，是世界上跨度最长、最具潜力的合作带。”

我们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是“把互联互通作为重点，以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为引领，推进公路、铁路、港口、航空、油气管道、电力、信息网络等领域合作，打造基础设施联通网络。我们决定继续积极推进经济走廊建设，办好贸易、产业合作园区，加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推动实体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我们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是个“开放的平台，各国都是平等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我们将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相互尊重、民主协商、共同决策，在开放中合作，合作中共赢。”

我们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经过三年多边筹备，边谈判边建设，到“今天‘一带一路’建设把沿线各国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致力于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让各国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这也是中方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目标。”“2014 年至 2016 年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 3 万亿美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 500 亿美元，中国企业已经在 20 多个国家建设 56 个经济合作区，为有关国家创造近 11 亿美元税收和 18 万个就业岗位。”

正像“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会联合公报所说：“我们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加强互联互通倡议和对接的努力，为国际合作提供了新机遇、注入了新动力，有助于推动实现开放、包容和普惠的全球化。”

（作者：农业部原乡镇企业局副局长，本文写作于 2017 年 5 月 26 日）

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合中国实际研究十大关系（题目）

郭书田

- 1、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 2、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 3、经济规律与自然规律
- 4、计划与市场
- 5、经济与社会
- 6、资源与生态
- 7、效率与公平
- 8、城市与农村
- 9、道德与法治
- 10、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

（作者：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本文作于 2017 年 4 月 24 日）

为打造国际一流的粤港澳大湾区而努力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年大会上讲话的心得

丁玉华

2017 年 7 月 1 日上午 9 点，我和老伴坐在电视机前收看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年大会实况。

现场气氛庄严热烈。习近平主席步入会场时，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此时此景，使人回想起 20 年前的 6 月 30 日晚上，我们全家 8 口，拥挤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电视大幕前，孩子们摄像、拍照，留下这历史的一刻。在零点之前，我们大声呼喊着重计时的数字“5、4、3、2、1”，全场欢声雷动。

大幕上，国歌雄壮奏响，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香港回归到祖国怀抱，洗刷民族百年耻辱，香港历史新纪元的大幕拉开。

20 载劈波斩浪，20 载春华秋实。“一国两制”在香港的伟大实践，演绎出精彩的时代画卷，这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丰碑上。

习近平主席在庆祝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斗转星移，岁月如梭。香港已经回归祖国 20 年。依照中国的传统，男子二十谓之弱冠，今天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成年礼，正所谓‘如竹苞矣，如松茂矣’。”“‘一国两制’是中国的一个伟大的创举，是中国为国际社会解决类似问题的一个新思路新方案，是中华民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的新贡献，凝结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国智慧。”“中央政府将一如既往的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他特别强调支持香港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发展战略中发挥优势和作用。

7 月 1 日上午，在习近平主席见证下，《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正式签署。备受期待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出实质一步，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描绘出美好蓝图。

推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有利于深化内地和港澳交流合作，对港澳参与国家发展战略、提升竞争力、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按照协议，粤港澳三地将在中央有关部门支持下，完善创新合作机制，促进互利共赢合作关系，共同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更具活力的经济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和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据统计，全世界 29 个人口超过 1000 万的超大型城市，其中临海型城市就有 19 个，有 14 个是首都城市。有关资料介绍，纽约湾区、东京湾区和旧金山湾区被称作“世界三大湾区。”从这些湾区的发展经验来看，湾区经济具有显著特征：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等等。我们吸取其经验教训，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世界第四大湾区提供有益借鉴。

纽约湾区是美国经济核心地带，是美国最大商业贸易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纽约湾区自 19 世纪中期开始逐步发展，随着 1914 年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纽约进入大发展时代。如今以其发达的金融和制造业、便利的交通、高水平的教育和良好的环境吸引了超过 4347 万人口，被视为国际湾区之首。

纽约湾区由纽约州、康涅狄格州、新泽西州的共 31 个县联合组成。它拥有优良的自然深入港——纽约港。该港不仅为纽约市带来大批财富及物产，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也通过纽约港进入纽约市，而这些移民及其后代都成为纽约发展的动力。

新华社驻纽约记者李桃、王文写了一篇文章《区域统筹规划成就纽约湾区》，他指出，从空间的布局分为两大部分：以华尔街为中心的金融贸易集群，是大银行、金融、保险、贸易公司的云集之地；而以第五大道为中心的商业区则聚集了世界一流品牌精品店、娱乐厅、酒吧等商业服务业。

纽约湾区有三次规划发挥了重要作用。1929 年发表《纽约及其周边地区的区域规划》是“第一次区域规划”，也称为世界上第一个关于大都市区的全面规划。规划提议，构建公路、铁路和公园网络，以及居住、商业和工业中心，作为该区域物质和社会发展的基础。

1968 年第二次区域规划，核心是通过“再集中”，将就业集中于卫星城，恢复交通体系，解决郊区蔓延和城市衰落的问题。

1996 年第三次区域规划——《危机挑战区域发展》，核心是凭借投资与政策来重建经济、公平和环境。

纽约湾区也面临挑战。气候变化、基础设施落后与恶化、公共机构负债制约管理等问题仍然威胁着居民生活、失业、住房成本、物业税和自然灾害等问题，受到居民的普遍关注。

东京湾区位于日本本州岛中部太平洋海岸，是一个纵深 80 余公里的港湾，为东西两侧的千叶县和神奈川县所环抱，与太平洋相连，面积 1320 平方公里，人口 3800 万。这里包括钢铁、有色冶金、炼油、石化、机械、电子、汽车、造船、现代物流等产业，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产业地带；还包括了金融、研发、文化和大型娱乐设施和大型商业设施等，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研发中心、娱乐中心和消费中心。

新华社驻东京记者胡俊凯写过一篇报道《东京湾区胜在全球化制造业布局》，认为日本的制造业立国、出口工业立国之所以能够成功，这是其布局上的秘诀。“东京湾区经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开放带来的多样性，而多样性是效率的源泉。”

当然，东京湾是典型的“先污染、后治理”，在战后工业化前期环境污染十分严重，并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东京湾内大规模填海造地也带来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其负面影响至今还存在。不过东京湾区对环境污染刹车较快，改得猛，很见效，这方面既有经验也有教训。

由于从规划、基础设施到城市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东京湾区作为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大都市圈，城市病却是最少的一个。

为什么在东京湾区会有中华街？当初横滨开港时，不知怎么跟外国人做生意，缺乏这方面的人手，于是从广州请了很多中国买办过来帮他们做洋人的生意，这些买办带来了许多厨师，后来这些厨师留了下来，做料理开餐馆，逐渐在湾区横滨形成了中华街这一大片特色街区。

旧金山湾区位于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濒临太平洋，是一片围绕旧金山湾和圣巴勃罗湾的地区。旧金山湾区包含 9 个县、百余个大小城镇，总人口 768 万，陆地面积 1.8 万平方公里。旧金山湾区从 19 世纪中期加州淘金开始发展起来，最早以旧金山为中心，随着 20 世纪中后期在以南数十公里的硅谷崛起，并成为全球创新重地和技术中心，技术经济占据了湾区半壁江山。

新华社驻旧金山记者马丹的文章《硅谷成为旧金山湾区活力源泉》，他指出，旧金山南湾以硅谷地区为主，云集了成千上万家高新科技企业，涉及计算机、通信、互联网、新能源等多个产业，这里的科技公司可谓是群星闪耀，如全球市值最大的两家公司苹果和谷歌公司，老牌科技巨头惠普、思科、英特尔等等。

以市场为主导的风险资本对支持和推动初创公司的成长起到关键作用。2015 年，美国大约 46.5% 的风险投资流入硅谷。

在人才方面，湾区的几所大学培养了大量高素质毕业生，成为硅谷公司源源不断的人才库。

建立区域协调机制。旧金山湾区的发展定位，包括硅谷形成和发展，政府很少干预。湾区建立了一些区域治理机制，帮助协调区域问题，在基础设施、生态保护、空气质量等方面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和管理。这些协调机制包括旧金山湾区政府协会、大都市交通委员会、湾区保护和开发委员会和湾区区域水资源质量控制委员会等。值得一提的是，湾区委员会寻求与中国的合作机会，开设驻华办事处等，以帮助湾区企业进军中国市场，同时努力为湾区吸引中国企业和投资。

住房和交通是长期困扰旧金山区的两大难题。高房价是造成湾区生活成本大大高于全美平均水平的主要原因。湾区是全美生产力最高的地区之一，然而高昂的生活成本削弱了湾区这一优势。2017 年 6 月，房屋中位价为 120 万美元，旧金山一居室的租金为 3500 美元。

旧金山许多低收入居民因无法承担高房价而搬出长期居住的社区，不少人流离失所，也有不少人被迫逃离

湾区。最新数据显示，湾区 20% 的潜在房屋买家希望搬出湾区，居住到房价相对便宜的美国其他城市，旧金山湾区成为美国人口外流量最大的地区。

粤港澳大湾区濒临南海，直通太平洋和印度洋。广东省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有丰富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和雄厚的经济基础。2016 年，广东省 GDP 为 79512 亿元，人口 1 亿，人均超过 1 万多美元。全世界超过 1 亿人口的国家只有 11 个。

深圳特区已被外媒视为“中国经济奇迹诞生的地方”，“深圳已变成城市巨人。”2016 年 GDP 为 1.94 万亿元，人口上千万。

东方明珠香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回归后，香港自身特色和优势得以保持，中西合璧的风彩浪漫依然，活力之都的魅力更胜往昔。”香港 2016 年 GDP 为 2.2 万亿元。

有这样好的基础条件，再借鉴世界各国建设大湾区的经验教训，我们坚信，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具有庞大的经济体量、宜人的环境、包容的文化、高效资源配置能力和更具活力的经济中心区，港澳和内地合作的示范区，国际一流的粤港澳大湾区。

（作者：农业部离退休干部局原局长、高级经济师，本文作于 2017 年 7 月 20 日）

创造全球新时代的“一带一路”

——学习习近平主席多次讲话的感受

张毓琮

生机盎然的 2017 年 5 月，北京迎来了一场关系人类共同发展的国际盛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有 29 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及联合国秘书长等 3 位重要国际组织负责人，130 多个国家和 70 多个国际组织的 1500 多名各界贵宾作为正式代表出席论坛，共襄盛举、共商大计、共享繁荣。这么多各国领导人齐聚北京讨论这一倡议，这是国际合作中前所未有的新鲜事。

早在 2013 年 9 月 7 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 10 月 3 日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提出共同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有关国家的积极响应。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借用古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融入新的时代内涵，既是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实现多元、自主、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方案；也是深化区域合作，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中国主张；更体现了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朝着公平、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责任担当。

2017 年 1 月习近平主席表示，此次峰会是一次集思广益的机会，各国可以借此为解决当前世界和区域经济面临的问题寻找方案，让“一带一路”建设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一带一路”旨在改善亚洲、欧洲和非洲的贸易与经济一体化。这一战略利用自由贸易协定和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公路、港口和铁路来建立一条跨越几十个国家的现代化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可高达 21 万亿美元，它包括一条穿越欧亚大陆的陆地经济“带”，以及一条将中国沿海城市与非洲和地中海连接起来的海“路”。

“一带一路”纯粹是经济项目，它将帮助创造一个对所有人开放、包容和有益的“全球化新时代”。

一、“一带一路”倡议符合中国自古以来的理念

中国先贤在长达几千年的社会实践中，凝结了丰富的独具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与政治理念，形成了至今仍然焕发强大生命力的价值观体系。例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观念；慎战义战、不战至善的观念；见利思义、义利合一的观念；修身齐家、志存高远的观念；亲仁睦邻、协和万邦的观念；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观念；华夷一家、国家统一的观念等等。这些观念是人类先进思想的结晶，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为我们今天建设全球合作共存新秩序的伟大斗争，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持和不竭的思想动力。

更值得重视的是两千年前，中国古代思想家在《礼记·礼运》篇中就鲜明地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政治思想。它强调了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为大家所共有。强调“家天下”、“霸天下”、“公天下”，而不是“私天下”。孙中山先生指出的“天下为公”，就是“提倡人民的权利，是人民天下的道理”。这些和我们今天构建的全球合作共存的新秩序理念是相通的。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激发着强大的生产潜力，科技进步提高了生产和生活效率。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各国之间利益纽带不断密切，共同面临的挑战日益增多；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符合全人类利益的开放合作理念面临威胁；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未能反映客观变化，体制机制革新进展缓慢；发达经济体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一些发展中国家尚未开启现代化大门；全球贸易投资体系有待完善，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尚未成型；相当多的国家基础设施不足；区域、次区域发展面临瓶颈制约。面对困难与挑战，唯有加强合作才是根本出路。正基于此，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全球和平合作和共同发展的中国方案。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是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平等相待、共同参与的合作；是公开、透明、开放，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正能量的合作；是传承丝绸之路精神，追求互利共赢和优势互补的合作；是各国共商共建共享，共同打造全球经济治理新体系的合作；是实现多元、自主、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合作；是推动地区发展，促进繁荣稳定，扩大文明对话和互学互鉴的合作。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核心理念与提出新型国家关系理念完全一致。

中国愿将自身发展形成的经验和基础，与各国发展意愿和优势结合起来，以共建“一带一路”作为重要契机和合作平台，促进各国加强经济政策协调，提高互联互通水平，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双边、多边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新型合作架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其平等包容的外在特征和契合实际的内在特点，体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共同利益，是面向未来的国际合作新共识，展现了中国梦与世界梦相互联通，各国携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望。

二、“一带一路”顺应时代潮流

中国是一个拥有近 14 亿人口、国土面积 960 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约 400 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国。是人类

历史上唯一历经 5000 多年风雨而未曾中断的中华优秀文明。中国历史上对世界文明做出殊多贡献，今天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继续做出较大贡献，应当在建构全球合作共存新秩序的伟大事业中负起应尽的历史责任。

三年前，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战略倡议，这是中国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的重大理论贡献，也是推进全球合作共存新秩序可操作的伟大实践，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推进全球合作共存的新秩序建设的“中国方案”，是中国应有的时代担当。“一带一路”超越冷战思维，顺应时代潮流，以各国共同发展为最大公约数，打通生产要素全球流通渠道，以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推动均衡、包容和普惠的全球化，破解全球经济治理滞后、增长动能不足、全球发展失衡三大矛盾，为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提供融入全球化的接口。

当前反全球化思潮、排外思潮、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当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理念正当其时。这一理念体现了中国担当国际局势稳定器的良好意愿，意味着中国通过展现开放、负责任的态度来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全球各国以及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建立一些长期机制，对全球发展有非常重要意义，中国为大变局时代贡献新方案。“达则兼善天下”的道德需求在当代中国实践中，就表现为实现共同发展的大国担当，这是“一带一路”思想的立足点。

三、“一带一路”最高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习近平主席访问瑞士时的主要讲演中，进一步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2017 年 1 月 17 日，习主席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发表题为《共创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时说：“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利益高度融合，彼此互依存”。1 月 18 日习主席在日内瓦万国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旨演讲时说，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对此，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一带一路倡议来自中国，但成效惠及世界”，这意味着“一带一路”不应过度强调其中国元素，而应看到承载的共同发展愿景与价值导向：“一带一路”建设将“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作为合作的原则，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作为合作指引，以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作为合作目标，正在成为沿线各国人民共同的梦想。从 2013 年以来 5 年间，我国陆续从郑州、兰州、昆明、重庆、成都、武汉、杭州、南京、浙江义乌等地开出货运列车，每列均经十余个国家，最远的从中国到英国又原路返回。沿途交易货品，帮助开发市场，建立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开发资源，建立港口、码头，修建电站，疏通油气管道，促进互通和交易，使沿途国家生产生活惠及百姓。较远在东、西非洲各修一条长达 1 千余公里的高速铁路，现在均修建一段，收到良好效果。我国同相关国家协商，计划从我国哈尔滨开始往北修一条高铁，跨过白令海峡到阿拉斯加，往南到加拿大首都，再往南抵达纽约。还同巴西、秘鲁协议，修一条从大西洋港口跨过该国到太平洋港口，连接两大洋长达 4500 公里的高速铁路。还有在尼加拉瓜修一条跨洋运河，现已由我国香港公司动工修建。这一梦想的最高形态是超越一切地域边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一带一路”思想的最高目标。

“一带一路”不仅是一个发展倡议，更是实现欧、亚、非文明共同复兴的重要思想理念，其重要目标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寻找最大公约数。习近平主席是这一伟大倡议的缔造者。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巨大贡献。“命运共同体”一词，是基于共同经济发展的集体安全新概念，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真正含意。这个含意就是尽力找到避免对抗的新途径，尽力找

到避免在冷战年代造成到的国际社会分裂的新途径。因此，它是努力创造国际经济融合，经济相互往来以及互相关，降低一批国家与另一批国家争斗的风险，降低与一些国家对抗的风险。

丝绸之路是一个创造双赢的计划，因为它本身具有内在的相互依赖性。从狭隘角度看，可能会有竞争或形成竞争，但从全面的角度看，这是创造物流领域的新事物。这是一种新观念，一个全新的市场，其容量足以支持所有利益相关者。所有项目互为关联，这就是“新丝绸之路”的本质——相互关联。

当前世界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程度日益提高，人类面临各种各样的严峻挑战。在这样的形势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国着眼于维护人类长远利益的远见卓识，对世界各国及联合国都很重要。这种理念基本上揭示了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实际情况，在如此紧密相连的世界里，国家不分大小都要相互依赖。当前世界各国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地球是人类共同拥有的唯一家园，整个人类拥有共同的命运。基于这一认识，2015年12月推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才通过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鼓励世界各国通过加强合作来努力实现共赢，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这一重要理念对联合国推动世界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非常重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一方面需要各国做好自己应做的事情，另一方面还需要各国就相关领域工作加强国际合作。如果没有国际合作，仅凭各国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四、“一带一路”写入联合国决议草案

美国东部时间2017年2月10日，正当海内外炎黄子孙喜迎元宵佳节之际，从纽约联合国总部传出喜讯，联合国决议首次写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巨大贡献。

2月10日还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了“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呼吁国际社会本着合作共赢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加强对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这是联合国决议首次写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决议还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等方便区域互联互通的一些举措。

写入这一理念的联合国决议草案，在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会议上没经过表决就直接获得通过，这表明这一决议草案在进行磋商的过程中，所有委员会成员已经普遍认同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写入联合国决议达成一致，表明了这一理念已经得到广大联合国会员国的普遍认同，体现了以稳健步伐迈向世界舞台的中国，向联合国提供可以惠及全人类的公共产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能够通过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以及联合国经济及社会发展理事会等联合国重要平台，在联合国系统和广大会员国中传播开来，作为各个会员国和联合国系统，合力建设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重要参考。

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主席查沃斯说：“从长远来看，世界各国和联合国都会从这一理念中受益”他说这一理念不是要人们去急功近利，而是要把眼光放得更加长远。他说“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国人看问题角度和眼光比其它许多国家更加长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中国人着眼于人类长远利益的远见卓识。”决议欢迎并敦促进一步加强地区经济合作，其中包括促进地区互联互通贸易与运输，落实“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对记者说，安理会决议首次载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体现了国际社会的共识，彰显了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对全球治理的重要贡献。

五、“一带一路”成为世界发展的机遇

习近平主席在 2017 年 5 月 15 日的讲话中说：目前全球面临着增长基础不够牢固、贸易和投资低迷、经济全球化遇到波折、发展不平衡加剧等挑战，仅凭单个国家的力量难以独善其身，也无法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他指出：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这为倡议的初衷，也是希望通过这一倡议实现的最高目标。

“一带一路”超越地缘政治。由于经济和文化差异、民族和宗教矛盾妨碍了国与国之间建立更加密切的合作关系。有些受地缘环境限制，没有出海口，自身经济结构调整和与国际经济接轨的进程都非常艰难，甚至沦为大陆上的经济“洼地”；有的国家在全球金融危机时，属于“重灾区”；有的国家甚至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难以摆脱困境，成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一带一路是一条百花齐放的经济动脉。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治理亟待创新，逆全球化席卷而来的重要时间节点，它提供了中国方案，带来了中国智慧。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为亚欧国家迎来了整体复兴的新契机。中国彻底摒弃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提倡一种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方式，指出历史上多民族、多种族、多宗教、多文化借丝绸之路实现交汇融合，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形成了“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的丝路精神。“一带一路”更看重地缘经济合作，主张超越地缘政治分歧，摒弃“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反对地缘政治对抗，主张区域合作开放、透明、不针对第三方，各国共同参与、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搭建多主体、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平台，海陆共进。

“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追梦征程与沿线国家渴望发展的历史进程，共生交融，携手同行。目前，已有 100 多个国家、国际组织积极响应，4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合作文件。从驰骋于亚欧大陆的中欧班列到非洲东西海岸的道桥施工现场，从中南半岛的跨国铁路项目到南亚次大陆的现代化港口，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基础设施建设，正在为相关国家和人民构筑联通网络，带来丰富的福利。

“一带一路”是造福世界的公共产品。世界历史演进到现在，人类社会越来越朝着安危与共、荣损相依的命运共同体迈进。“一带一路”顺应这一潮流，摒弃制度模式偏见，超越意识形态藩篱，信得是众人拾柴火焰高，谋得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从三年多来的实践看，“一带一路”不仅传承了古人开辟的丝绸之路，追求合作的基因，更蕴含着改变零和博弈，创新国际秩序的志向。不久前，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呼吁各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并载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东方智慧与全球治理的全面对接，正把中国发展机会变成世界发展机遇，也将中国希望化为世界图景。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各个国家、各个区域组织之间将开展更为密切的平等协作，建设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正如阿根廷研究中心主任古斯塔沃指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通过重塑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正在编织一张立体化的贸易投资网络，让过去居于全球化边缘的次区域国家获得发展机会，新时代的探险者们将沿着这条新的丝绸之路，发掘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一带一路”不仅将推动全球化向均衡、包容方向发展，也将促进全球治理机制向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迈进。

“一带一路”思想以实现中国梦与世界梦相融通为出发点，归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三年多来，“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由近及远，由易到难，从周边与发展中国家到全人类层层递进，从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相互衔接，正在引领近代以来百年未有之变局。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过程中，实现“中国应对人类有较大贡献”的承诺，展示“一带一路”让世界更美好的大国担当。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缓慢复苏，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尤其是 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当今世界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加强互联互通，各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结成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面向未来的发展新格局，共同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共同探索新的增长动力。让中国梦、亚太梦、世界梦，在这里融会贯通，汇聚起更磅礴的世界能量，凝聚起强大的国际共识，并以前所未有的进取心态、开放气度、合作取向、共享精神，为当今时代和未来历史谱写光辉篇章！

（作者：农业部经管总站原副站长，本文作于 2017 年 6 月）

农业利用外资记事

张开平

1978 年以前，我国农业的对外交流是不多的。五十年代，主要是同苏联、东欧、蒙古、朝鲜等国进行科技合作；当时，在苏联援建我国的 156 项中，有一项是在黑龙江省集贤县建设中苏友谊农场。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退专家，我们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交往也随之减少。七十年代，主要是承担对非洲一些国家的援外农业项目。毛主席曾说过，是第三世界国家用轿子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我国在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派遣了大批农业专家赴非洲“顶替台湾农耕队”，真心诚意的帮助这些国家发展农业生产。在这段历史时期，我国农副产品的进出口和经贸活动均由经贸部所属的粮油、土畜产、化工……等进出口公司统一经营，农业部门很少直接参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央做出了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要求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同时，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步骤，从扩大进出口贸易到借用国外贷款和吸收国外直接投资；从允许外商在我国举办合营企业到兴办经济特区、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1985 年，中央和国务院又决定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厦门）、漳（漳州）、泉（泉州）三角地区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由外向内，由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把沿海经济的发展同内地经济开发紧密结合起来，促进全国经济振兴，人民富裕。在这一伟大、壮阔的历史背景推动下，我国农业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也开始了蓬勃发展。

我于 1973 年调到农林部外事局一处做项目工作。这个处主要任务是组派农业专家，赴非洲 20 多个国家“顶替台湾农耕队”，援建农业项目。1978 年，恢复农垦部，我又调回农垦部，在外事局援外处工作。由于体制的原因，农垦的外经工作起步较早，当时，这项工作也由援外处兼办。1982 年，农口机构大调整，三部一委

（农业部、农垦部、水产部和国家农委）合并成立新的农业部，我调到农业部外事司对外经济合作处工作。在一次参加全国利用外资工作会议期间，我同林干同志探讨了农业外经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林干同志当时已从我国驻联合国粮农组织代表的职位上卸任，回国后，在农业部计划司担任副司长，对国外的情况比较了解），我们一致认为，农业外经工作跟不上国内蓬勃发展的新形势。应该讲，外经工作与外事工作还是有区别的，外经工作不仅要积极开辟渠道，争取外资，更重要的是抓好落实。比如：国内配套资金的落实、债务的担保和偿还、进出口物资的审批、管理机构的执行能力等，哪一项工作跟不上，都会影响外资项目的进展。因此，外经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国内。同时必须组建、培养一支比较稳定的专职人才队伍，跟踪项目，及时发现问题，帮助解决问题。我们的建议，得到了何康部长、部党组和部人事司的大力支持，1983 年，经有关部门核准，以外事司对外经济合作处和计划司进出口办公室为基础，组建了农业部对外经济工作办公室（简称外经办）；国家编委正式核批了 80 个人员编制，除外经办 4 个处外，还包括农业、农垦、畜牧、水产和科研教育 5 个项目办，从组织和管理机制上，进一步强化了农业部的外经工作。我于 1993 年从外经办退休，由于身体状况尚可，仍在从事一些外资项目的咨询服务工作。现将我所了解的农业利用外资一些情况和体会记述如下。

借船出海

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有：合资经营、合作经营、独资经营、租赁融资、加工装配和补偿贸易等多种方式。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的产品，在当时绝大部分用于出口，赚取外汇，我们称之为“借船出海”。在我国习惯将加工装配和补偿贸易这两种方式统称为“三来一补”，“三来一补”是改革开放初期，农业部门利用外资较为普遍的对外经济合作方式。

“三来”，即由外方提供来样（产品样式）、来料（原材料）、来设备（或资金），由中方组织加工装配，收取加工装配费并按外方规定的时间和要求交货。这类产品主要是服装、鞋袜、玩具、办公用具和初级电子产品。此种合作方式，虽然技术含量不高，资金规模不大，中方收益很低，但却简单易行，风险较小。一个项目，可安排几十、几百人劳动就业，装配一块电子表，只有 0.05—0.10 元；加工一束塑料花也只有 0.15 元左右。在这样的基础上，艰苦奋斗，发展壮大，逐步形成了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乡镇企业。

“一补”，也就是“补偿贸易”，由中方（企业）向外方客户赊购技术和设备，然后以项目生产的产品，向外方分期偿还技术和设备的本息。这种方式资金规模较大，技术含量较高，涉及的部门较多，协调工作也比较复杂。

黑龙江农垦“洪河农场项目”，是我经历的第一个补偿贸易项目。我国东北生产的黄大豆，蛋白质含量高，适宜制作各种豆制品。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日本就从我国进口一定数量的黄大豆，由于数量小，而且供应不稳定，不能满足日本国内的需求。对外开放后，日本急迫要求扩大中国黄大豆的进口。“日绵株式会社”是日本进口大豆的三大贸易商之一，也是“中日友好协会”的成员，在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方面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他们建议在黑龙江合作建设一座生产大豆的农场，以保证大豆的稳定供应。经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的引荐，由农垦总局（不久恢复为农垦部）负责接谈。谈判的气氛很好，但分歧却很大，主要集中在购置农机设备的主导权、贷款利率水平、偿还大豆的价格等方面。经过数次考察和谈判，达成了初步协议，借用“日绵”贷款 1350 万美元，年息 7%（当时的年利率水平是 8%左右），在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场管理分局范围内，开荒 30 万亩，建设现代化的洪河农场，并由中方根据需要自主采购先进的农机设备（包括在第三国），由所生产的大豆，分五年偿还日方贷款的本息。偿还大豆的价格，按当年广交会的成交价确定，贷款本息偿还完毕，项目引进的

技术和设备全部归中方所有。经部领导批准后，我起草了报告和3个合同（草案），报有关部门审批。由于当时利用外资管理计划的体制还没有理顺，国家计委不予审批，中国银行也不能承办对外担保和此类项目的资金往来业务，我只好又去找国家进出口委。魏玉明副主任看了报告后说，我支持这个项目，你们再报一次吧，主送计委、农委和进出口委，我来想想办法。后经魏玉明同志的协调，国务院5位领导对报告“圈阅”同意，致此，项目在国内协调工作也比较顺利了。在黑龙江农垦总局和建三江分局领导和职工的积极努力下，项目的进展很快，从美国引进的一整套先进的农业技术装备，在开荒中也发挥了威力。但是，“天不作美”，从建场开始，垦区就遭受连阴淫雨，从泥水中抢收回来的“花脸豆”，达不到出口标准，第一年偿还就遭遇挫折。当时，不知从哪里又刮起一阵批判“洋跃进”之风，风力所及的洪河农场项目正好是一个风靶。对此，高扬部长召开了部党组扩大会议，我汇报了项目过程并做了自我检查。我于1954年抗美援朝回国后，随部队集体转业到黑龙江省虎林县“屯垦戍边”，在八五零农场（铁道兵农场）工作了九年，自认为对北大荒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我和垦区同志的想法是一致的，想通过这个项目引进国际上最先进的农业技术装备，去啃“硬骨头”（当时，垦区使用的大多是斯大林80号拖拉机，是由铁道兵退役推土机改装的，马力小，对草根层厚的千年沃土很难垦动，经常是梁断铧折）。在选址上，虽然考虑了低洼地的不利因素，在排水工程上作了安排，由于配套资金不到位，工程未能完成，造成积水不能及时外排。在起草合同时，其中一项为“如遇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可延期还款”的风险条款，但是在谈判时日方提出，项目成立后他们将减少从美国进口大豆的期货合同，如果延期偿还，他们的客户（加工厂）将会停产，如发生此种情况，希望中方在东北其它地方调剂大豆出口。在中方内部讨论时，参加谈判的黑龙江总局领导和垦区的同志也不同意延期偿还，因延缓一期就要多负担100多万美元的债务；另一方面，也存在侥幸心理，北大荒开荒怕涝不怕旱，那两年正是旱情比较多见，对可能发生的特大涝灾估计不足。几经商议，总局领导最后表示，同意日方意见，即使洪河遭灾了，垦区3500多万亩耕地，几千吨大豆还是拿不出来？我在上报审批的合同（草案）中，将延期偿还的条款删去了，这是我的失职和失误。赵凡副部长在发言中，力驳了不实之词，承担了领导责任，使我深受感动。之后，高扬部长做了总结，表明项目是好的，情况是清楚的，不是什么“洋跃进”，并由黑龙江农垦协调，在总局范围内调剂一部分符合出口标准的大豆偿还债务，指出差价由总局垫付还是由洪河内销的大豆支付则由总局商定，议论到此为止，工程要抓紧完成。经过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在五年时间内，用5万3千吨大豆偿还了全部债务（由于大豆涨价，比项目初期预计的少还了2000多吨）。农场五年累计开荒40万亩（比原计划多开了10万亩），兴修水利工程1150万方，营造林地1.5万亩，修建了厂房、粮库、宿舍、幼儿园……在中苏边境的亘古荒原兴办了一片现代化农业新区。具有关资料记载：1981—1984年，洪河农场平均每个农业工人负担耕地1842亩，生产粮豆15.1万斤，产值5.84万元，职工（全员）人均创利润3125元，这4项指标分别为建三江农场管理局内13个农场平均值的3.8倍、7倍、12.4倍和11倍，充分显示了现代农业机械化、社会化大生产的威力和作用。洪河农场不仅成为了垦区的对外窗口，而且为以后垦区利用外资，积累了实践经验。姚依林副总理曾批示，像这样的项目应多办几个。通过洪河项目，我吸取了一条深刻的教训：要提高利用外资的风险意识，对于“不测风云”要有多种防范预案，不能存在侥幸心理。

补偿贸易原则上是用项目生产的产品偿还，但是也有列外。吉林农垦同意大利菲亚特合作的“莲花泡水稻农场项目”，不是用水稻而是用项目外的人参和鹿茸偿还的。鉴于当时国内粮食供应的形势，主管部门不同意用水稻补偿。吉林农垦针对还有一批库存的人参鹿茸，提出用这些产品予以偿还。当时菲亚特公司正在同我国农机部商谈洛阳拖拉机厂的技术改造，这个项目的投资规模很大，菲亚特为了展示他们农机产品的优越性，促

进“洛拖”大项目的成功，最后同意了参茸补偿方案，同时提供 100 万美元的无偿援助，帮助吉林建设一座农机修配厂。欧洲人不知参茸为何物，我们组团赴意大利菲亚特进行农机选型时，吉林参茸公司张云鹏经理带去了一些参茸样品，并对参茸的医药作用做了详细介绍。据说，在意大利 7 个人中就有 1 个人在菲亚特工作或提供服务。菲亚特的管理层，曾号召公司员工踊跃购买吉林参茸，帮助公司消化项目补偿的产品。有一次，我因公经过罗马，一位菲亚特朋友请我吃饭时就拿出了他制作的参茸食品，参茸酒是用威士忌泡制的，人参炖鸡加了不少黄油和巴西香料，味道怪怪的，却另有一番滋味。马可波罗曾从中国引进了面条，经过几代人的创新，据说能做出近百种口味各异面条，成为风靡欧美的一道西餐主食。这位朋友还兴致勃勃的介绍了他准备在意大利都灵开办参茸餐馆的设想。

我告诫他说：参茸虽好，但有不少禁忌。我无法从西医的角度解释阴虚、阳虚、上火等中医学的概念，他听了也是一头雾水，表示下次轮调到北京常驻时，去学学中医。贸易的往来，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而后者比前者的影响却更加深远。

农业采用与外商合作经营这种方式，是七十年代末期从广东兴起的。项目涵盖种植业和养殖业。由中方提供土地、房屋、场所，外商投资进口设备、建筑材料、仪器、种畜、种苗、药物、船只和交通运输工具、饲料等，所有纯利除逐年扣除外商的投资外，余下部分双方按一定比例分成（一般在收回投资前外商占 70%—80%，中方占 20%—30%，收回投资后双方各占 50%），合作期满后（一般为 10—12 年）全部财产无偿归中方所有。当时影响比较大的有：广东华侨农场同新加坡外商在海南岛澄迈县合作种植 13 万亩油棕项目，在花县和清远县合作种植的 4600 亩甜叶菊项目，这两个项目引进的优良品种和配套农艺，为以后大面积推广起了示范作用。深圳光明农场同港商合作，引进了一整套鲜奶加工设备，使鲜奶的品质达到国际卫生标准，不到两年时间，项目生产的鲜奶，已占到香港市场销售量的 70%。台山县四个公社通过合作经营方式从香港引进了 94 艘装备比较先进的捕捞船，用大眼网到深海区作业，鱼货随时速冻，保鲜期从原来的 6—7 天延长到 30—45 天，鲜鱼、活鱼在香港的售价大幅度提高，这四个公社渔民的生活也先一步富裕起来。

八十年代初期，合作经营方式逐步向内地扩展，天津农垦与法国合作的“王朝葡萄酒”就是成功的一例。这一项目引进了法国低温发酵技术，使生产周期从国内传统的 2—3 年缩短到 2—3 个月，不仅周期短，成本低，而且品质优良，在获得德国国际博览会金奖以后，销量激增。当时，北京三里屯使馆区有这样一个传言，“吃和平门烤鸭，喝王朝葡萄酒，是北京最好的美食”。但由于产量小，90%供应出口，国内市场很难买到，使馆举办招待会如果有王朝葡萄酒，多是由北京建国饭店从香港购进的。由于项目效益比较好，中法双方都加大了投资规模，增加了产量。通过这个项目使我对市场经济有了一些认识。

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窗口是对外经济贸易部，该部外资局的张上塘和初保泰同志在业务上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借鸡下蛋

十年文化大革命，给我国经济建设的正常运行造成了严重损害，国内商品供应十分匮乏，粮食按定量供应，糖、棉、油、布均须凭票购买。

1980 年 5 月，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在这个谈话中，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支持“包产到户”和“大包干”，表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

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他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

这个谈话为农村的改革拨开了迷雾，指明了方向，此后，农村的改革形势迅速发展起来，并且逐渐形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在“六五”计划期间，随着中央5个“一号文件”的颁布，逐步在全国农村普遍推行。到1983年年底，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已达当时生产队总数的99.5%，其中实行包干到户的占到生产队总数的97.8%，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的积极性。

一方面是修养生息，另一方面，为了改善民生，国家在外汇非常紧缺的情况下，还从国外进口了大量的农副产品，以缓解国内的供需矛盾，1979年，全国就进口了谷物1050万吨，还签订了每年进口谷物1200—1600万吨的合同，当年还进口了棉花80万吨，油料80万吨。

“六五”计划是拨乱反正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文革”后认真总结长期社会主义建设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按照中央提出的从1981年到20世纪末20年内力争实现我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部署制定的。“六五”计划把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放在了优先地位，国家急迫要把农业搞上去，但是又不可能大量增加对农业的投入，由于各种原因，“六五”对农业的投入比“五五”计划还有所减少。缺乏资金已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1983年9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利用外资工作的指示中，进一步强调了利用外资的意义和作用，并对利用国外资金和吸收国外直接投资所涉及的原则、政策、管理等方面作出了明确指示。继后不久，国务院又明确规定，在利用世界银行贷款中可安排25%的资金用于农业（包括农业、水利和林业），按照当时利用世界银行贷款规模测算，每年用于农业的金额可达5—7亿美元，这是一项很大的投入。

农业部门对利用外资是非常积极的，除了世界银行贷款外还积极开辟了其它外资渠道，如：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贷款和外国政府贷款等。“借外国的鸡，下中国的蛋”，兴建了一大批农业发展项目，改善了农业的基础设施，增加了农副产品的市场供应量。世行是我国农业利用外资的主要渠道之一，我这篇记事里主要谈一下世行项目的情况。

世界银行集团系由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和国际金融公司三个机构共同组成。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开发协会实行两块牌子一套机构，但协会的财务是独立的，国际金融公司则有自己的业务机构和法律部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简称世界银行（世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和国际关贸协定（即以后的世贸组织）是国际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三大组织。

世行成立于1945年12月，我国是创始成员国之一。世行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各成员国缴纳的股金和通过发行债券等形式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借款，世行的主要任务是向发展中成员国提供贷款，资助兴建国民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建设项目。

世行贷款有两种：一是“软贷”，偿还期35年（含宽限期10年），无息，对已使用的贷款支付0.5%的手续费，对未使用的贷款支付0.75%的承诺费。二是“硬贷”，偿还期15—20年（含宽限期5年），贷款生效后按贷款总额一次缴纳手续费0.25%，对已使用的贷款收取利息（浮动利率），对未使用的贷款收取0.75%承诺费。

“软贷”以最穷国家为援助对象，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410美元以下的国家；“硬贷”以较贫穷国家为对象，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810美元以上至1985美元以下的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410—810美元之间

的国家可享受“软、硬混合贷款”。国际金融公司则以发展中国家的私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为援助对象。

1980年8月22日，世行正式恢复了我国在该行的合法地位。世行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进行了两次全面考察。第一次考察，主要了解我国经济的沿革和现状，确定了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410美元以下，可以获得“软贷”认证。但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实际获得的是“软、硬”混合贷款。第二次考察，主要是研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我参与了世行两次考察中农业专题的接待和讨论，对世行的性质和贷款政策逐步有所了解，初步接触了西德和日本如何利用外资振兴战败后的经济，以及菲律宾和印度如何利用外资进行“绿色革命”（发展谷物生产）、“白色革命”（发展乳制品生产）的案列。

我国对世行的窗口是财政部，利用世行贷款计划由国家计委和财政部联合报国务院审定。在计委和财政部的支持下，第一批世行贷款中就安排了三个农业大项目：一是由国家农委牵头利用世行贷款7400万美元，改善和发展农口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基础设施、培训师资项目（建设29所院校、21所科研机构、13所中专、10所推广站、2所外语培训中心）。二是，由农业部牵头，利用世行贷款6000万美元，在山东、河北、安徽3省9县对300万亩盐碱地进行综合治理，增加粮、棉、油项目。三是由农垦部牵头，利用世行贷款8000万美元，在黑龙江东部开荒300万亩，建设现代化粮豆生产基地项目。这批项目于1982年相继上马。

1987年，国家对财政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利用外资分成了两大块：一块是由中央部委牵头办理的打捆项目（含2个以上省、市、自治区），另一块是由省、市、自治区主办的地方项目。农口机构调整以后，由农业部牵头主办，在“七五”、“八五”、“九五”计划期间均相继上了一批跨区域的世行农业项目，例如：在14个省市建设良种田和种子加工中心项目；在江西、福建、浙江、广西等南方红壤地区建设的红壤改良一期和二期项目（一期含2个省，二期含5个省区）；在8个大中城市郊区发展淡水养鱼项目；在四川、湖北、重庆30多个县市生产优质柑橘为主的长江水果项目；在14个省市自治区加强农业支持服务体系建设项目……以及农业教育科研二期项目、农业科研三期项目等（农业教育科研项目不仅是农业部门，也包括林业和水利部门的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山东、河北、广东、甘肃、四川等10几个省市自治区，也相继建设了一大批本省市自治区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世行不仅对项目提供优惠的长期贷款，更强调对借款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援助。世行机构非常重视对借款国经济发展趋势的跟踪监测评价，并同借款国对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共同进行专题调研，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在选择项目时，非常重视项目的前瞻性和示范性，在项目的建设内容和完成目标设计中，尤其强调“扶贫、环保和提高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并支持在项目中包括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方面的建设内容。

中国是世行的股东（执董）之一，虽然认交的股金不多，却是世行最大的借款国。我国同世行的合作关系是良好的，成效也是显著的。世行派遣的项目官员和聘任的专家，绝大多数都精通业务，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给予我们很大帮助。在合作过程中，也经常产生一些矛盾和争执，除了1989年6月4日“天安门事件”西方国家对我制裁，世行暂停了部分项目的执行和西部扶贫项目中，由于达赖喇嘛的挑衅和破坏，我国政府声明，将青海从项目中撤出，由国内资金建设等少数事件外，项目中的其他问题基本都能得到解决，不断加深了相互理解和信任。

世行的项目很多，我只能选择几个不同的类型做些介绍。在第一批项目中，农业教育科研项目成效是显著的，贺修寅、金村夫、肖瑞林等同志比我更了解项目情况，在这里我就不重复了。

一、华北平原盐碱地改良项目

华北平原是我国主要的粮棉油产区之一，由于频繁的旱涝灾害，大量土地次生盐碱化，造成作物产量不高。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在这个地区建立了三级农业科研机构，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总结了许多治理和改良盐碱地的成功经验，但由于缺乏资金，未能大面积推广。

1982年6月，利用世行软贷6000万美元，治理和改良华北平原300万亩盐碱地的项目正式启动。世行项目经理丁文波（马来西亚人），率团来华考察时，充分肯定了中方提出的技术方案。

项目于1986年12月竣工，在3省9县领导和农户的共同努力下，获得了很好的效益。（1）采取了山、水、林、田、路、土综合治理，提高了农田抗御灾害的能力。（2）作物总产量大幅度提升，总产量从项目前的35.41万吨提高到94.22万吨，增加了166%。（3）增加了项目区农民的纯收入，山东为63%，河南为100%，安徽为114%。（4）引进了世行项目周期、招标采购、财务支付、影响评价等概念和一整套做法，提高了投资项目的管理能力。

这个项目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但是在世行内部却引起了一些议论：（1）项目的技术方案是由中方土法上马的，世行未能提供更多的技术援助。（2）国际招标太少，6000万美元贷款，项目只用了2000万美元从国外进口了高效低毒农药、复合化肥和少量农业机械，4000万美元，用于国内。这些议论，对丁文波先生造成很大压力。1989年4月，世行业务评议局组团对项目的执行情况进行了审查，通过实际考察，充分肯定了项目所取得的显著成效。1990年世行组团来华，对二期项目进行考察，为解决配套资金的困难，将项目交由财政部成立的国家农业开发办牵头执行（用土地占用税配套，农林水部门共同设施），项目名称改为“加强农业灌溉（一期）项目”，世行贷款3.35亿美元，于1991年6月4日正式上马。为了表彰丁文波先生在多个农业项目中所做的工作，经农业部申请，国务院领导在人民大会堂为他颁发了“合作友谊贡献奖”。

项目在农业部副部长万宝瑞的主持下，认真总结了世行在项目管理方面的经验，结合计委的有关规定，制定了“农业区域开发管理（暂行）办法”，规范了农业投资项目的管理。

二、黑龙江农垦项目

利用世行贷款8000万美元，在黑龙江农垦总局范围内开荒300万亩，建设现代化的粮豆生产基地项目，于1983年4月29日正式上马。总局认真总结了以往的经验，采取了“一水、二路、三开荒”的方针和步骤，避免了“早年开一片，一涝又不见”的教训，加强人员培训，不断提高项目参与人员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通过竞争性招标，引进了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农业生产技术装备2813台套，项目完成全部设计任务，只用了世行贷款7000万美元，项目竣工时将节余的1000万美元，退交财政部用于它用。

这一项目的成效是显著的，项目的设计能力是年产粮豆37.5万吨，在建设期间即累计生产粮豆75.3万吨；引进的12座粮食处理中心，在解决粮食干燥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北大荒收获季节，时逢雨季，经常是男女老少齐上阵“龙口夺粮”，但损失仍然严重，在干燥设备建成后的两年时间内，就处理了粮食10万吨，减少了损失8000余吨。为了消化吸收和推广粮食干燥及种子加工技术，垦区集中农机科研和机械力量组建了“东方农业技术设备联合体”，在三年时间内，即为垦区和解放军农场制造和安装了粮食处理中心78座，其中一台还出口到苏联。

三、橡胶发展项目

橡胶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是钢铁的翅膀，2.5吨钢铁就需搭配1吨橡胶，我国只有广东湛江，海南岛和云南、福建、广西的少部分地区适宜橡胶种植，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一片“宝地”。叶剑英元帅非常重视橡胶生产，并给予了积极支持，在海南岛澄迈县建立了热带植物学院和热带植物研究院，何康部长曾担任过第

一任两院院长。为了进一步发展橡胶生产，更新老化低产品种，1982 年我国即向世行提交了在海南岛发展橡胶项目的申请。世行组团来华进行项目识别，不同意上这个项目，理由是：（1）国内橡胶价格比国际价格高出 1 倍多，经济财务效益不好，不如进口合算。（2）海南岛粮食短缺，跨海运粮成本太高，不如就地发展粮食生产。我们不同意识别团的理由，他们也是心知肚明的。考虑到国内橡胶收购价格高，这为历史原因，我国的国营农场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开疆辟土建设起来的，不仅是生产单位，更是一个社会单元，医院、学校、邮局、新华书店、百货公司……都要靠自身的积累建设。橡胶价格的扭曲，实为国家对国营农场社会投入的一种补贴。通过算细账，我们认为实际成本可予国际价格持平，也可达到项目内部报酬率可接受的水平。同时我们承诺要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逐步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经过多方努力，世行贷款 1 亿美元的橡胶发展项目终于在 1983 年 4 月 19 日正式启动，不久，还利用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建设了橡胶木加工厂，将更新橡胶木和枝桠，加工成高质量的压缩板材，进一步增加了项目的效益。

四、农村政策调整项目

“六五”计划后期，在经济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猛，货币发行过多，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经济过热现状。价格的双轨制，助长了社会上的“抢购风”，如果不解决物价严重扭曲问题，就不可能将产品经济转到商品经济领域中来。

1988 年 5 月 19 日，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政府军事代表团时指出，中国的改革要“过五关斩六将”，物价改革虽然风险很大，但是“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同年 6 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改革有险阻 苦战能过关》，文章认为：中国的改革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性阶段，到了非解决物价问题不可的时刻。

为了配合农村经济政策改革和“七五”计划期间的“价格闯关”，当时的农口负责人杜润生同志向国务院领导建议，利用世行的政策调整贷款，进行改革试点，中央同意了这一建议，世行也给予了积极支持。1988 年 6 月，我们利用世行 3 亿美元，进行农村政策调整贷款项目正式启动，在 11 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改革试验区，对放开农副产品价格进行了试点。这个项目的 5 项承诺，除“土地银行”一项未实施外，其它各项均按设计完成。此项目采用了一种新的模式，即由新组建的中国农业投资总公司管理和实施，该公司第一任总经理就是“十七”大以后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岐山同志。

五、粮食流通项目

“八五”期间，我国的经济有了快速发展。在农业连续取得丰收的大好形势下，又出现了“卖粮难”、“卖猪难”。为了探讨这一问题的对策，我们同世行组织了粮食问题的调研，邀请了社科院、农科院和商业部的专家和领导进行座谈，时任我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同志对当时的粮食形势作了深入分析，我陪同世行中国局农业处处长戈德堡到实地进行了考察。在吉林，我们看到农民的房前屋后，房顶炕下堆满了黄澄澄的玉米，问他们为什么不拿出去卖时，则回答：这里家家户户都种有玉米，集市上没人要，卖给粮库，尽打白条，不给现金，还不如搁在家里放心。我们又到广东等沿海地区考察了解到，由于运输原因，一些饲料加工企业在当地买不到玉米，只好用外汇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去购买。通过调研，取得共识：（1）卖粮难和卖猪难不是因为生产过剩引起的，粮食的总产量还是不足的，为 10 几亿人口的粮食安全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必须大力发展粮食生产。（2）当前的困难主要在于流通领域。除了要进一步加强粮库、码头、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推进流通领域的体制改革，建立粮食批发市场，完善市场化机制。国务院副秘书长白美

清同志对这个项目非常积极（当时他已从商业部长调任国务院），经过多次协调，最后将项目内容集中在粮食流通领域的建设和改革上，由商业部组织实施，我们向商业部办理了移交。自1993年6月全面启动，世行提供了4.9亿美元贷款，此项目的完成，对我国粮食流通和管理机制的改革发挥了积极作用。河南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建立，使国内外粮食交易有了一个操作平台。在实施过程中也有过一次比较严重的失误，由于在竞争招标中的违规操作，被停止支付6个月进行整改。

六、长江上中游农业发展项目

柑橘原产于中国，早在2200多年以前，楚大夫屈原在【楚辞·九章】中，就写下了“橘颂”，通过赞誉柑橘的“独立不迁”、“深固难徙”、“苏世独立”来比喻人的高洁品格和情操。随着丝绸古道的开通和明朝三宝太监郑和下南洋，我国长江的柑橘和伏牛山的猕猴桃就走向了世界。

全国解放后，北方的苹果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南方的柑橘仍在吃着祖宗的老本，虽有一些改进，但好的品种未能形成商品性生产。万里长江，从四川宜宾到湖北宜昌，是种植柑橘最适宜的地带，气候温润、土壤酸碱适度，柑橘的病害较少。但是，种植粮食作物（玉米）不仅产量低，而且容易造成水土流失，据说，周恩来总理在视察四川、湖北等地时就讲过，应该发挥这里的区域优势，建立长江柑橘带，造福于人民。可在当时全国农村正在高举“以粮为钢”的大旗战天斗地，总理的意愿未能实现。

1987年，为帮助农业部设在深圳的机构扩展对外业务，我们组团赴香港对市场情况进行了调研。香港商会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过去在香港一统天下的南方柑橘，已退缩到仅占两成；在超市看到，在货架上摆放的鲜亮柑橘和脐橙都是从美国加州和澳大利亚进口的，我们有名的秭归脐橙，由于规格不一，表皮灰暗（未经打蜡加工处理），只能在街边摆摊甩卖；而美国脐橙的口感虽然比四川锦橙差，但价格却高出两倍多；当时南方兴起的果汁饮料，都是从国外进口浓缩果汁调制的。了解到这些情况，既感到沮丧又看到了发展的潜力和希望。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的增加，市场对水果的需求也日益扩大。为了振兴柑橘生产，农业部于1988年向世行提出了发展长江柑橘带的项目建议书，经国家计委和财政部的同意，世行派团来华考察。团长伊萨（美籍、埃及人），性格豪迈、热情，虽然因车祸锯掉了一条腿，在崎岖的山路上杵着双拐考察，却从不要别人帮扶。他对项目选址非常满意，认为比地中海柑橘带的条件更加优越。在沿途中，他对改良品种、病虫害防治、产品的储藏加工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项目的准备工作进展比较顺利。料想不到，期间出了两件事：一是，国际第七届柑橘大会对世界柑橘发展做了悲观的估计，认为柑橘生产已经过剩，价格将大幅下滑，世行管理层对这个项目的发展前景并不看好。二是，1989年6月4日，发生了“天安门事件”，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经济制裁，世行项目除农业、环保项目外，大部份都暂停执行。1989年底，伊萨先生率团来华对项目作最后评估。我们一行乘船到达白帝城，伊萨先生杵着双拐，跨越了100多级石头台阶，一同到达山顶。我给他讲了三国时刘备在白帝城托孤的故事，并开玩笑的问他，“我国平均5个人，才能吃到1个柑橘，即使这个项目年生产能力达到30万吨，也不会过剩。”“你这次来华，不是托孤的吧？”，他慨然一笑，说道：为了避免主要柑橘出口国产生误会和刺激，你们是否考虑在提交执董会讨论前，对项目名称和内容做些调整？我听后心中一亮，在白帝城吃到了最地道的四川泡菜，并陪同伊萨先生一行到厨房参观了泡菜的制作工艺。

回京后，我向计委和财政部做了汇报，并组织省区的同志一起，加班对项目可研报告做了修改，将“长江柑橘带项目”改为“长江上中游农业开发项目”，并将建设内容添加了少量的桃、李、柠檬等品种；在市场分析部分，重点放在国内，对外捎带了苏联和东欧；并对项目的经济财务效益从新作了测算。后世行执董会是如

何讨论我不清楚，但却获得了世行执董会批准。项目于1990年8月9日正式上马。

这个项目含四川、湖北、重庆的30个县（区），世行贷款6400万美元。联合项目办公室主任由农业司副司长高麟溢兼任，在陈耀邦副部长的支持下，成立了由章文采、杨枕霞、李仕宏等一批著名的教授、专家组成的项目科技委员会，在联办和科技委的主持与指导下，柑橘的产量和质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对全国的柑橘生产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经过十年的努力，市场上柑橘、脐橙的品种多了，品质有了很大改善。长江柑橘贴上自己的标签重新走出了国门。

七、“西南扶贫”和“秦巴扶贫”项目

通过改革开放，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减至1985年的1.25亿。不过，在农民收入全面增长和总体贫困大幅度下降的同时，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却不断扩大。1986年开始，中国政府启动了大规模的农村扶贫开发计划，农村贫困人口到1993年进一步下降到8千万（国家统计局，2000）。然而，剩下的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自然条件恶劣、脱贫难度大的边远地区，近90%集中于西南大石山区（严重缺土）、西北黄土高原区（严重缺水）、秦巴贫困山区（缺少耕地、交通状况恶劣、水土流失严重）以及青藏高寒区（积温严重不足）等四类地区。由于这些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薄弱，社会经济发展落后，人们思想观念保守，文化技术水平低下等复杂原因，扶贫难度愈来愈大，扶贫投资效果呈现下降趋势，使中国的扶贫工作进入到攻坚阶段。针对这种情况，我国政府于1994年3月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明确提出“从1994年开始到2000年，用七年时间基本解决尚未完全解决温饱的8000多万人的温饱问题”的扶贫目标。为了顺利完成《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探讨通过与国际机构合作，大规模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获得国际组织解决大片区域贫困问题的新理念、新方法，经当时国务委员陈俊生建议，我国政府与世界银行从1993年开始了中国西南扶贫项目的准备，并于1995年6月正式实施，1997年6月又正式启动了中国秦巴扶贫项目。

我有幸参与了这两个大型扶贫项目从准备到实施的全过程，于1993年9月从农业部外经办退休，11月就应聘到国务院扶贫办外资项目管理中心担任项目总顾问，投入了“西南扶贫”项目的前期准备。

西南扶贫项目，涉及广西、云南和贵州三个省（区）的35个国定贫困县以及广西南宁、北海和防城三个市（主要是安排贫困县输出的劳务人员），项目总投资42.3亿人民币，其中世行贷款2.475亿美元。秦巴扶贫项目，涉及四川、陕西和宁夏三省（区）的26个国定贫困县，项目总投资29.88亿人民币，其中世行贷款1.8亿美元。

这两个项目在扶贫思路和项目设计上有不少新的做法：（1）目标多元：项目的目标不仅要解决项目所覆盖的4739个行政村、117万4000贫困户、515万人的温饱，而且还要培养一支素质与能力比较高的项目管理队伍，探索形成一种更适合中国扶贫开发实际情况的运作机制。（2）内容综合：基于贫困成因的综合性，项目安排了8个方面的建设内容，即基础教育、农村卫生、劳务输出、农村基础设施、土地与农户开发、乡镇企业发展、机构建设与贫困监测，采用综合措施扶贫。（3）投资多元：除了世行贷款外，国内配套资金，按性质划分有扶贫贴息和非贴息贷款、以工代赈扶贫资金和财政发展资金。（4）调动多方参与的积极性：一是贫困农户的参与，让农户充分参与项目选择、实施及管理的决策，让项目农户明确其权利、义务和责任，并保证农户从广泛参与中受益。二是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项目县、乡的主要领导）的参与，要他们充分认识项目、重视项目、并有效地协调、解决项目执行中的主要问题。三是相关专业部门的参与，确保一些技术要求较高的分项目能按标准实施，达到设计目标。（5）坚持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在做好村级规划的基础上，采取综合

措施，集中投入，整体推进。

扶贫项目比一般的农业开发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有更多的难度。在国内方面：（1）配套资金的多元化。各种资金都有自己的一套管理办法，集中到一个项目使用，会遇到许多矛盾；虽然采取了“同烧一炉香，各敬各的神”，但是，有一位尊神感冒了，势必影响到资金的及时到位，延缓项目进度。（2）部门协调。参与扶贫项目的业务部门很多，协调的工作量很大。（3）人员培训。扶贫干部工作是非常勤奋的，但是，要在短时期内使他们懂得世行这一套繁杂的程序和管理办法也是不容易的。领导小组副组长高鸿宾，项目办正副主任王国良、刘毅涛等同志有长期扶贫工作的经验，在以上 3 个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在对外方面，主要集中在采购问题上，通过友好协商，大多得到解决。

“西南”和“秦巴”两个扶贫项目，不仅为我国的扶贫工作创建了一种新的模式，而且为农村医疗卫生和农村教育改革提供了借鉴。在上海召开的有许多国家领导人参加的“国际扶贫大会”，“西南扶贫项目”作为一个成功的案例向大会进行了介绍。

八、加强灌溉农业节水项目

1998 年 8 月，我应水利部刘斌同志的邀请，到水利部世行办担任节水项目专家组组长。由于我对水利工程不熟悉，在新的领域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学习和实践。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人均水资源占有量 2300 立方米，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 1/4；亩均水资源占有量 1800 立方米，只有世界亩均水平的 2/3。由于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不均，占国土面积 50% 以上的华北、西北、东北地区的水资源量仅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 20% 左右，农业的季节性、区域性干旱缺水问题十分突出。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农业用水在社会总用水量中的比重将会不断下降。进入 90 年代以来，黄河断流的问题日益突出，农业年均受旱面积达 3 亿亩以上，全国 660 多个城市中一半以上存在水资源短缺问题，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 72%，由于灌溉方式落后，全国农业灌溉水的有效利用率只有 40%，仅为发达国家的一半左右；单方水的粮食生产能力只有 0.87 公斤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 2 公斤以上的水平，农业节水的潜力很大。

为了进一步增加对农业节水的资金投入，引进和借鉴国际上在农业节水方面的先进技术和经验，经国务院批准，水利部向世行提交了利用世行贷款 7400 万美元，在北京、河北、青岛、沈阳的 26 个县（区）发展节水灌溉 160 万亩的项目建议书。

世行组团来华考察，双方在项目的设计思路发生了比较严重的分歧。中方提出的方案集中在水利工程方面：修建灌排渠系（解决大水漫灌和渗漏）、增加喷灌、滴灌、低压管道等设施，提高水分生产率；世行专家认为，这样不能实现“真实节水”，可能还会增加用水，并介绍了美国 70 年代在西部发展节水灌溉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世行提出的“真实节水”，在许多人的情感上都难以接受，难道说过去 20 多年，国家投入几十亿资金，辛辛苦苦搞的节水灌溉，都是“假节水”吗？双方就什么是“真实节水”？如何实现“真实节水”？农民节约了用水应如何补偿？等问题，邀请了国内外数十位著名的专家、教授进行了热烈的研讨。经过 8 个月的讨论和磋商，双方基本达成共识，即在水资源平衡分析的基础上，采取综合措施，降低蒸腾蒸发（ET），实现资源性“真实节水”，并以此新思路重新设计项目。

项目设计了三大目标：农民增产增收、节约水资源、实现水资源和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三大措施包括：水利措施、农业措施、管理措施。这三大措施不是分离的，而是在子项目施工设计中必须根据当地情况，围绕

如何降低蒸腾蒸发（ET）要求，综合考虑、打捆投入、集中管理。从中央到省市设立了专家顾问组和流动专家组进行监测、改进和管理这些技术方案的实施。同时还成立了农民用水小组和供水组织，由农民自主管水用水，按成本缴纳水费，并建立了项目信息管理系统（MIS），及时跟踪项目进程。

经过中外双方的共同努力，项目于 2006 年 6 月竣工，成功的实现了项目规定的目标。（1）项目区小麦、玉米、棉花、棚菜大幅度增产，单方水的粮食生产能力达到 2 公斤左右，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农民纯收入较基线（2000 年）增加 2170 元，提高 103.2%。（2）在保证粮食产量的前提下，四省市的蒸腾蒸发值有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五年累计“真实”节水量 43542 万立方米，减少开采地下水 8436.6 万立方米。（3）地下水下降的趋势得到遏制。五年项目实施期，北京市项目区地下水累计下降了 0.92m，而非项目对照区累计下降了 2.5m；河北省项目区累计下降了 0.9m，而非项目对照区累计下降了 2.64m；青岛市项目区地下水累计下降了 0.02m，而非项目对照区累计下降了 0.69m；沈阳市项目区地下水累计回升了 1.40m，而非项目对照区累计下降了 2.02m。

实践说明，农业节水的新思路、新办法是可行的。经世行验收后，世行管理层将这个项目评为“非常满意”项目。为了进一步扩展成果，检验在流域级范围内的可操作性，在世行项目经理奥森和蒋礼平先生的努力下，又申请了“全球环保基金”1700 万美元赠款，用于“海河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项目”（包含水质和水量），这个项目由水利部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实施。

2008 年 5 月，国务院已批准将农业节水二期项目列入世行贷款三年滚动计划。

鉴于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发展成就，已于 1999 年 7 月 1 日从“软贷”毕业，以后所利用的世行贷款均系“硬贷”。截止到 2007 年 6 月 30 日，世界银行对中国的贷款总承诺额累计近 422 亿美元，共支持了 284 个发展项目，其中农业项目 71 个（含农、林、水利），贷款额 105.94 亿美元，占世行贷款总额的 24.25%，世行评价中国是执行世行贷款项目最好的成员国之一。

农业利用外资的渠道还有很多，世行贷款仅是其中的一个。

（作者：农业部原外经办主任，此稿于 2017 年 6 月 20 日提供）

农业合作的真谛是服务

张蓝水

一、罗须代尔合作原则

1844 年在英国距曼彻斯特不远的罗须代尔镇诞生的“公平先锋社”，是由弱势工人组成的以消费为主的合作社，被称为世界第一个成功的合作社。1895 年，国际合作社联盟成立，把罗须代尔的办社原则列入联盟章程。1937 年该联盟将之归纳为 7 项，称之为“罗须代尔原则”。但提出，对于一般经济组织，只有基本原

则的前4项就可以被称之为合作社。此后，国际合作社联盟对“原则”的文字多次修改完善，直到1995年版本。经历百年，这4项基本原则虽文字略有变化，但主题依然。其精神已成为合作社的基本组织准则。

1. 自愿与开放的社员制。任何人只要能够利用合作社提供的服务并承担社员义务，均可入社，不受政治、宗教、种族和性别的歧视。

2. 民主的社员控制。合作社是由社员控制的民主组织，社员主动参与合作社的政策制定和决策。由社员选举出来的管理人员要对社员负责。在自然人自愿联合的基层合作社，社员有一人一票的平等投票权，其他层次的合作社也要以民主的方式组织。

3. 社员经济参与。以社员对合作社公平出资，作为取得社员资格的条件，出资只获取有限报偿。社员民主参与控制合作社资本。资本必须有一部分为合作社共同财产。合作社盈余的分配：a. 建立合作社发展公积金；b. 按社员与合作社交易额配给社员；c. 投向社员认可的其他项目。

4. 自治与独立。合作社是社员管理的、自治的自助组织。如果合作社要同其他组织（包括政府）达成协议，或者要从外部筹资，必须以确保社员的民主管理和自治为条件。

二、合作是人类之必然

按照许倬云观点（见2017年6月5日北京日报），人类还是一群野兽的时代，他们不能以个别的人对抗恶劣的环境，也无法抵抗凶猛的虎豹豺狼。显然，在原始人时代，人类就有天然的合作要求。人类以合作的集体力量找到了自存之道。进入到渔猎时代，人类已经难以以个人的力量取得生活的资源，即是说，合作以谋生，成为人类生存的前提。到了农耕时代，人类开始定居，并形成初始农业。在生产水平低下的条件下，耕种过程特别是整地、播种、收获短暂而紧张的劳作，非有农家之间的合作、相互帮工，才能达到目的，以取得稳定的维生资源。

我国有一套始于南宋，延续至清代的《耕织图》。从这份农桑生产成套图像资料的23幅耕图看出，我国农民自古就有协作、合作传统。没有农家相互帮工、换工协作，古代农业生产无法顺利进行。一是农业本身特有的季节性和时效性。种植和收获有自然规定的特殊农时，必须在短期内尽速完成，不能一个人延续很长时间。二是有的农活劳动强度大，一个人难以完成。有的劳动环节是连续的，需要几个劳动力同时作业，邻里间帮工、换工是必然选择。农户之间这种天然的帮工协作传统，形成农业合作机制初型，成为维持农耕社会正常运行的润滑剂。

我们把“合作”的视野放大一些，人类生存的基础就是合作。人类社会就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合作的群体。没有合作，不成其为社会。一个人不可能事事亲历自为。生活中，人的衣（他人做的衣）、食（他人种的粮）、住（他人盖的房）、行（他人造的车），这一切都要从合作中才能得到满足。作为社会的人，人们感触最直接、体会最深的就是城市人与农村人的合作。城市人每天都要食用农民生产的粮食、肉蛋奶、蔬菜、水果等农产品；同样，时下农民生产，一点也离不开城市人生产的机器、电力、车辆，化肥、农药、塑料制品等工业品。现在，即使生活中的一些食料半成品、服装等，农村人也完全靠城市提供了。当然这些都是没有契约的合作，也可以说是宏观的合作。如果有超出这个基础的更具体目标、更深层次的合作就要制定有契约、有明文合同的合作方案，如罗须代尔式的合作社。

从更大一点看，国际贸易、互通有无，国际分工、全球化，其实都是基于各自特点的一种地球人的国际合作。合作才能使全球人生活得更美好。国际合作常常是有契约、有明文合同的合作。

按照尤瓦尔·赫拉利 [以色列] 著《人类简史》提供的分析，人类是这个地球上唯一可以进行大规模有效合作的物种。他提出“人类的想象就是人类合作的关键”。他说，人类可以想象出一些故事，然后进行传播，只要所有人都相信同一个故事，那么所有人就会遵守同样的法律法规。人类经济活动也是基于一些共同的故事。钱是有史以来人类讲述的最成功的故事，从本质上来说，钱或者货币就是信任。按照《人类简史》的提示，社会信任引发的共同行动就是合作。

三、合作天生有专业性

罗须代尔的“公平先锋社”是由弱势工人组成的以消费为主的合作社。这使我们感触到，从世界上第一个合作社诞生起，合作社天生就是专业性质的，即为了一个具体目的、目标，解决某群体某方面的具体困难，就可以建立一个专业合作社。这种合作是在肯定参加合作社成员自有财产的前提下，以解决个体不便做到、难以做到的事物的难题，即为成员分忧解难。这样的合作社人们才能自愿参加，愿意利用合作社提供的服务，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不只是把土地、生产工具、牲畜等财产入社，人也要受合作社管理，使社员家庭失去了财产自主权和人身行动自主，后来又失去了作为家庭基础的行炊功能。这违背了罗须代尔“社员管理的、自治的自助组织”的基本合作原则。其发展到顶峰的“人民公社”最终被农民所淘汰，是社会实践的一次深刻历史教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改革开放以来 2006 年 10 月 31 日我国第一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诞生。

该法对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了如下定义：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其性质为“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其成员核心为“同类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充分体现了其专业性。如小麦、水稻合作社，养猪、养鸡合作社等。

该法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作了明确规定：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其核心是“为成员服务”，包括技术、信息，购销、加工、贮运等。

该法提出合作社应遵循的原则：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成员地位平等，实行民主管理；以服务成员为宗旨，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盈余按与合作社交易量比例返还。这充分体现了罗须代尔的核心合作原则。

四、国家支持专业合作

国家对农民专业合作的支持，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49—52 条有多处表述。国家提出支农建设项目，可以委托和安排有条件的相关专业合作社实施；中央和地方财政分别安排资金，支持专业合作社的信息、培训、农产品质量标准认证、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市场营销和技术推广等服务。对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对生产国家与社会急需重要农产品的专业合作社给予优先扶持。该法提出，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应采取多种形式，为专业合作社提供多渠道的资金支持。同时，专业合作社还享受国家对农业生产、加工、流通、服务等涉农经济活动相应的税收优惠。

法律规定专业合作社接受的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和他人捐赠形成的财产可以平均量化到各个成员，并按此比例获得个人分配收益。

五、切忌搞财产“归大堆”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承认农户承包权的前提下，为解决同一专业农业生产经营中单一农户不便做到、难以做到的事项，为求得公共服务，而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合作社既无权也无责接收成员的承包地和牲畜等生产资料，搞所谓统一经营。即使是为了农户脱贫也不应这样做。如这样，实行“敲钟上工”，势必会出现劳动“大呼隆”，出工不出力，重蹈人民公社的覆辙。这不仅不利于、还会有损于农业生产力发展，有悖于专业合作社宗旨。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为合作社确立的职能，可以归纳为产前、产后的多项实体服务，当然还有农业技术和信息服务。而“农业生产”过程的耕整、种植、收获等重点生产环节是由土地经营者自己打理的，若需要农机，可以自营或外请。这是与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生产合作化”显著不同点。其根基是“专业合作”不涉及财产权，即土地“承包权”入社。按照三权分置原则，承包的土地可以自愿、依法、有偿转让给其他农户经营，即“经营权”转让。“农业生产”由职业农民组织家庭农场去经营。但是不能把土地加入专业合作社，或者说专业合作社不能直接经营土地。这就保证了合作社成员的财产权不会丧失，又不会出现在“统一经营”名义下生出的种种弊端。至于“农业生产”环节的运作，职业农民既可以自营机器耕作，也可以雇佣农机耕作。家庭农场为了解决服务事项仍然可以组织或加入某些专业合作社。

据说，有的农村试验一种土地股份合作社，以解决未转让土地农户的农业生产规模化问题。这应该是在承认成员的土地财产权前提下，计入成员承包地数量，按比例扣除管理费、经营费等及生产成本、经营利润之后，以土地数量分配收益和红利。这实质是土地经营权转让的一种探索。这与法定的专业合作社不同，不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范的范畴。

一个农户如果既种植小麦、玉米，又种植蔬菜、水果，为了获得各专业性的服务，就可以加入几个不同的专业合作社。由于合作社具有“团购”优势，同样商品要比农户单独购销会获得更多优惠。

六、合作社勿贪大求多

农民加入某专业合作社是为能够“利用合作社提供的服务”，以使自己的农业经营能够在市场上获得最好效益。专业合作社的核心任务就是办好对成员的产前、产后的实体服务和技术信息服务，故应该在“服务”上下苦功。不应贪大求多总想着办企业，赚大钱。即使办企业也应该通过合同制承包给清正廉洁、有经营头脑和实业能力的农户，合作社对之加强资本和合同管理，不应搞成实为“社长”一人说了算的所谓“集体经营”。非经社员真正民主决策，不应轻易办大企业。专业合作社要在能够保证正常运行的条件下，把全部身心放在服务上，从为成员服务中增加公共积累。

七、合作忌用私人冠名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民“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这个性质决定了它不是私人组织，而应是“社团法人”。这与私人企业性质有根本区别，与“私人帮会”是水火不相容的。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提出一个合作社最低成员为5户，要“有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名称”。这5户之间是一种互助、合作的经济关系。既然如此，合作社就应该选择一个共识的名称，而不能用某个私人名字命名，即使是最早发起人或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用私人名字命名，无法体现合作社的原则和精髓，与该法精神不符，这会显得不伦不类和浅薄；还要防止有人借此一人说了算，破坏合作原则。

遗憾的是实际生活中以私人名字冠名的合作社并不罕见，究其原因，或者是没有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进行登记，未取得法人资格，或者是登记机关执行人法制观念不强，没有按照该法精神办理登记。这些不应有的错误，一旦发现应尽快改正，以防后患。

八、运行极差应该破产

据《经济参考报》2017年5月6日报道，农村无运作的“空壳合作社”频现，有的只为获得国家专项补贴。运作的合作社多与成员“粘性”不强，难以发挥合力；有的没有专业会计和规范的财务管理，无法获得贷款。这些阻碍合作社正常发挥作用的现象，大多是未原原本本地执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缘故。宣传学习不够，理解精神不深，执行法规不严，解决处理不力，是出现问题久拖不决的主要原因。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合作社是“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应该说是成员管理的、自治的自助组织。其实，从宏观角度来看，法律规范和注册登记，本身就是国家对专业合作社的一种管理。该法没有规定合作社的一个具象的主管行政机关，只规定政府对“合作社的建设和发展给予指导、扶持和服务”，所以合作社的自律是第一位的。合作社的运作程度取决于农民的需求程度。国家对合作社的支持、优惠和补贴对象应该是运行正常和优秀的合作社。对空壳社的套利行为，国家执行部门应该有所警惕和防范。登记应严格，对空壳和运行极差的社，应执行解散和破产条款。

九、不忘初志服务至上

随着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大田农业生产将从小户转化为规模化、集约化家庭农场为主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小户种植业、养殖业需要专业合作社服务，家庭农场的种植业、养殖业照样需要专业合作社的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的真谛归根结底是为成员提供周到的服务。

合作社一定要选择好热心服务的理事长和工作人员，充分发挥合作机能。坚决反对那种徒有虚名，却无服务之实，甚至以套取国家支农优惠为目的的空壳社、坏芯社。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应该在修改中规范对这种不作为、坏作为的专业合作社的处置条款。让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罗须代尔合作原则和该法的指引下健康发展，不忘初志，服务至上，使之成为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坚强的组织保证。

（作者：《经济日报》高级编辑）

中国二十四节气传承保护现状概述

王晓鸣

编者按：中国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人的重大科学创造，已列入联合国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不仅对指导世界农业生产有重大意义，而且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本文弘扬传统文化中，能让人们自觉顺应自然规律，发挥“顺天者兴，逆天者亡”的导引作用。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人通过长期观察，将太阳周年视运动轨迹（即黄道）划分为 24 等份，每一等份为一个“节气”，统称为“二十四节气”。它形成于黄河流域，是古人对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的总结，是中国人特有的时间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长期以来指导着传统农业生产和人们的日常生活。

二十四节气还是中国传统历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标注在国家通用的日历中。在国际气象界，二十四节气还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人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传承和保护好二十四节气是每一代中国人的神圣使命。在以往二十四节气的传承保护过程中，前人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进行了各种有益尝试、探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二十四节气，使二十四节气在新的时代焕发新的光彩，本文拟对目前传承保护方式进行梳理，以期对二十四节气未来的传承保护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一、二十四节气传承保护情况概述

（一）二十四节气列入非遗名录情况

2006 年 5 月 20 日，由中国农业博物馆作为申报主体申报的“农历二十四节气”作为民俗项目获国务院批准，成功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1 年 5 月 23 日，浙江省衢州市“九华立春祭”、浙江省遂昌县“班春劝农”、贵州省石阡县“石阡说春”民俗项目，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扩展项目名录”。

2014 年 11 月 11 日，浙江省三门县“三门祭冬”、湖南省安仁县“安仁赶分社”、湖南省花垣县“苗族赶秋”、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壮族霜降节”民俗项目，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

此外，2006 年河南内乡县衙“打春牛”列入河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 年浙江杭州“半山立夏习俗”列入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6 年 11 月 30 日，中国“二十四节气”正式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二十四节气入选国家及联合国非遗以及相关项目入选国家级非遗扩展项目名录，一方面是将二十四节气及其相关活动以遗产的名义确定下来，从国家乃至世界层面给予关注、保护和重视，另一方面也带动了不同地区类似遗产的抢救保护，加强了广大民众对于二十四节气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宣传保护二十四节气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展演、交流、活动情况

1、传习场所情况

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天文测量建筑之一——河南登封古观象台，至今仍在向人们讲述着二十四节气的故事。每年这里都会不定期组织中小学生进行户外实地教学，学习和掌握利用观星台测量日影、测算节气的方法。每年夏至，来自郑州、洛阳以及附近地区的天文爱好者，也会来到古观星台，进行日影的测量。同时，告城观星台传统观测技术传承人曹书敏至今一直在不间断地进行着测影活动。

山西省襄汾县陶寺城遗址古观象台，形成于公元前 2100 年的原始社会末期，由 13 根夯土柱组成，呈半圆

形，半径 10.5 米，弧长 19.5 米。从观测点通过土柱狭缝观测塔尔山日出方位，确定季节、节气，安排农耕。考古队在原址复制模型进行模拟实测，第二个狭缝看到日出为冬至日，第 12 个狭缝看到日出为夏至日，第 7 个狭缝看到日出为春、秋分。

北京天坛公园南门西侧护城河北岸，建二十四节气公园，公园总体面积为 2 万平方米，主体部分为 24 根节气柱，柱高 7.2 米，每根节气柱上均刻有该节气的介绍、歌谣和代表性图案，每组节气柱周围，还分别散落着精雕细琢、呼应节气的二十四番花信的花球，丰富和完善了二十四节气的科学知识。与此类似的还有华中农大二十四节气柱，是武汉市华中农业大学人文社科楼南面小广场的一处人文景观。

此外，二十四节气主题景观及传习场所还有：

浙江衢州市柯城区九华乡妙源村我国现存惟一的春神殿

中国农业博物馆二十四节气圭表

中国北极阁气象博物馆室外展区二十四节气图

北京地坛公园二十四节气地雕

北京鸟巢景观大道二十四节气景观

安徽淮南八公山二十四节气景观

宁夏吴忠市中华黄河坛二十四节气图腾柱

陕西西安钟鼓楼二十四节气鼓

四川南充市气象公园二十四节气竹筒浮雕

湖南郴州市汝城神农园二十四节气图

广西南宁市气象科普园二十四节气浮雕墙

广东佛山市第一中学二十四节气圆盘

河南商丘市古文化旅游区花戏楼正对着的三商大道两侧二十四节气石刻

山东济南市历山路解放桥附近二十四节气文化墙

山东济宁汶上县二十四节气广场

山东莱阳市照旺庄镇西陶漳村农趣园二十四节气雕像

海南三亚市亚龙湾“图腾雕塑群”文化广场二十四节气雕像

天津市天后宫中刻有节气歌的石块

安徽淮南市“二十四节气”主题邮局等。

以上种种，或古老或现代，作为景观或传习场所，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时刻提醒着人们这项文化遗产之重要和宝贵，也时刻在向人们宣传和科普着二十四节气。

2、相关民俗活动传承情况

20 世纪 80 年代后，浙江遂昌大田村村民自发组织上千人参与的班春劝农活动，基本复原古代祭春活动场面。从此，遂昌西部地区民众纷纷效仿，规模也越来越大，成为遂昌城乡群体的民俗活动。2009 年，大柘镇大田村建立了“班春劝农”活动基地，举办一年一度的班春劝农活动。同时建立了大田“民俗馆”，收藏农耕文化的实物资料，对农耕文化采取系统的保护。

2005 年柯城区九华乡妙源村恢复了“立春祭”，至今已举行 12 次。每年的立春日，当地人都会举行仪式祭祀春神句芒，青年男女头戴鲜花，进行包括贴春牛图、扮芒神、迎春、鞭春、踏春、探春、采春、尝青、戴春等仪式，并有演戏和各种娱乐活动。

贵州石阡县每到立春时节前后，春官手端春牛，走村串寨，派发春贴，进行说春活动。

陕西白水史官乡每年谷雨都要举办仓颉庙会，并于谷雨这天公祭或民祭仓颉。

湖南安仁春分前后三天赶分社，祭祀炎帝神农氏，举行开耕仪式，以求风调雨顺。这三天，大家吃药膳、买谷种、交易中药材。

从 2012 年开始，杭州拱墅区每年立夏举办半山立夏节活动，有摘青豆、搭灶头烧乌米饭、称人等活动。

每年立秋时节，苗族同胞身穿盛装，成群结伴，在传统秋坡上欢聚，进行打秋千、吹笙、歌舞等各种传统民俗活动，共庆“赶秋节”，祈求五谷丰登、生活幸福，青年男女则在赶秋节上以歌传情，寻觅佳人。

每年霜降节后的 9 天内广西壮族地区的天等、大新、德保、靖西、那坡等县会举行壮族霜降节，酬谢自然、庆祝丰收，祈盼五谷丰登。

每年冬至时节，浙江三门县海游镇悬渚村举行祭冬仪式，有取长流水、吃冬至圆、祷告祈天、拜祖、演祝寿戏、设老人宴等民俗活动。

此外，北京海淀区苏家坨镇、昌平区百善镇孟祖村立夏喝立夏粥活动、东城建国门街道的立春舞春牛活动、南锣鼓巷的惊蛰活动、和平里街道举行的夏至节、上杭稔田镇李氏大宗祠的春分祭祖活动等民俗活动，使得二十四节气相关习俗得以在民间活态传承，鲜活而生动地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3、学校教育活动

“让年轻一代有兴趣去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技术去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能力去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对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最好的保护方式之一。”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业务指南》中要求“在根据本地具体情况编写的学校课程中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

《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05 年 12 月 22 日）也明确指出“教育部门要将优秀文化遗产内容和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纳入教学计划，编入教材，组织参观学习活，激发青少年热爱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对儿童及青少年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不仅有利于青年一代综合素质的提升，更有利于我国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因此二十四节气的传承非常注重学校教育。

二十四节气相关内容融入幼儿园、中小教育课程中，如小学语文课本有《节气歌》，《新华字典》附录有《二十四节气表》，高一地理课中二十四节气是必修知识点等。除此之外，各地还根据自身情况设立特色课程、编写乡土教材、举行节气活动，如北京海淀区上庄中心小学编写校本教材《二十节气与我们》，依托二十四节气，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河南告成中小学讲述二十四节气相关内容，并让学生有意识地去背诵相关谚语。杭州胜利小学开办“谷雨”时令课程，让孩子们在谷雨这天给二十四节气排排队，合唱节气歌、聆听“谷雨祭海”“谷雨茶乡”“谷雨仓颉”的民俗故事、学习农谚、亲手设计制作书签送给爸爸妈妈、民俗知识竞答大擂台等。苏州图书馆胥中分馆在 2010 年 12 月份以“中国二十四节气与民俗”为主题，为胥江实验中学的学生们开展为期一个月的阅读课，向同学们介绍二十四节气相关知识，并推荐有关二十四节气及民俗的相关书籍。2013 年贵州石阡县花桥镇设立花桥中学说春传习班，使非遗进校园工作得到长效持续有序开展，举办了“说

春”比赛，花桥中学少年宫最具特色的“说春”兴趣小组还在说春室举行了“春贴”印刷竞赛。中国农业博物馆走进校园，为孩子们讲解二十四节气相关知识。黑龙江博物馆开办“第二课堂”之《二十四节气之旅》。此外，春分时节进行立蛋活动，立夏举行碰蛋、称人活动等也是很多幼儿园、小学经常举办的节令活动。这些活动的举办使孩子们从小就对二十四节气有所关注和了解，其影响将会渗透到他们未来的成长和生活中，使二十四节气及其精神得以代代相传。

4、艺术创作情况

二十四节气是很多文人墨客、艺术家们的题材，因此以二十四节气为主题的艺术创作丰富多彩，如二十四节气系列插画、绘画、博古图、篆刻作品、书法作品、文学作品、邮品等，并在此基础上举办的书画展、艺术展等，此外还有根据二十四节气创作的艺术演出，如北京现代歌舞团的大型舞剧《二十四节气·花间十二声》，以二十四节气为创意，结合南方广东狮鼓和传统书法艺术的特点创作的二十四节令鼓等。这些艺术创作以艺术的形式传播和弘扬着二十四节气，对二十四节气文化的传承保护具有积极意义。

（三）影像记录情况

二十四节气的影像记录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影片，一类是照片。与文字记录相比，影像具有视觉与听觉的直观性，在表达上往往具有文字难以比拟的力量，因而对提高人们就民俗类“非遗”保护的意识有强烈的积极作用。

中国中央电视台“人与自然”栏目1997年2月到1998年1月19日播出《二十四节气》，播出时间延续整整一年。

北京电视台纪实频道2012年策划并拍摄《二十四节气微纪录短片》，拍摄时间历时一年，小组成员自驾全国，行程累计三万公里拍摄完成，还通过与网络合作，结合征集网友创意视频作品制作完成。

新东方烹饪教育携手土豆网倾力打造《舌尖上的二十四节气》，介绍不同节气适宜当季食用的美食。

中国农业博物馆拍摄《二十四节气》，常年在博物馆三幕影院播出。

此外还有很多摄影爱好者，用手中的相机记录着各地二十四节气之美。

（四）媒体宣传情况

如今在大力弘扬和宣传优秀传统文化的大潮下，二十四节气成为各媒体关注和宣传的要点，每到一个节气，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媒体都会对相应节气进行报道，对民众进行科普宣传。如作为国家主流信息载体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会在相应节气播报二十四节气。就在2016年立秋时节，中央电视台还特别制作了节气公益广告《赏二十四节气品五千年文明》（立秋篇），邀请著名主持人康辉代言。有的网站专门设立了二十四节气专栏，如北京电视台BTV纪实设立二十四节气网页、新华网二十四节气专栏、中国农业博物馆二十四节气专栏、中国天气网二十四节气专栏等，向民众系统而全面地介绍二十四节气相关知识。

二、二十四节气研究情况

（一）相关论著情况

二十四节气相关论著蔚为大观，从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二十四节气综述类，包含二十四节气相关知识、农事活动、民俗活动等的介绍，如王晓梅编著《一本书读懂二十四节气知识》、董学玉和肖克之主编《二十四节

气》、高倩艺编著《二十四节气民俗》等；指导农事类，如安徽省农林科学院编《节气和农事》、陶毓汾和朱履宽编著《节气气候农业》等；养生类，如迷罗荐《24 节气养生法》、曾子孟著《黄帝内经二十四节气养生法》等；文学艺术创作类，如林帝浣著《时光映画：镜头中的二十四节气》、李颜垒著《新岁时歌：古诗词中的二十四节气》等；生活指导类，如《跟着节气去旅行：亲子共享自然的 24 个旅程》、种籽设计《台湾渍：二十四节气的保存食》等，在此不一一列举。这些论著有从学术研究角度进行分析的，有从大众科普角度进行描述的，还有用唯美图画形象说明的，从不同侧面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需求，在二十四节气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进行了有益而有效的尝试，对二十四节气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保护作用。

（二）相关论文情况

二十四节气相关论文也极其丰富，有历史溯源角度的，如沈志忠《二十四节气形成年代考》、梅晶《上古节气词的演变及二十四节气名的形成》等；有传承发展角度的，如周红、刘东南《谈传统民俗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以二十四节气为例》、尚超《浅谈二十四节气的文化内涵及文化传承》等；有农业生产角度的，如王丽、周双玲《二十四节气与农业生产》、王廷彩《二十四节气与农业生产的关系》等；有不同地区民族角度的，如房若愚《哈萨克族节气的牧业特点及比较研究》、王国民《从二十四节气看北方地区水产养殖》、孙敏桢《日本的旧历与二十四节气》等；有养生角度的，如陈霖《从八卦太极图看二十四节气养生》等；有非遗保护角度的，如包艳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视角下的“春捂秋冻”》等；还有学校教育角度的，如王荣荣的《二十四节气融入幼儿园课程的行动研究》等，不一而足。不同学者从各自视角对二十四节气进行着研究和诠释，对二十四节气的文化内涵、传承方式进行着深入的挖掘和探讨，从宏观和微观视角对二十四节气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问题与展望

综合以上种种，这些保护方式对二十四节气的保护传承、文化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并对唤起全社会抢救保护二十四节气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认知都具有积极作用，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然而在未来二十四节气的传承保护中，如何使二十四节气在经历了几千年发展变化的社会环境下，在当今科技日益发展，人与自然之间依附关系的紧密程度发生变化时，在农业生产不再完全依赖于靠吃饭的情况下，对于二十四节气的传承保护如何做，到不形式化，不为保护而保护，如何更加深入地探寻其精神内核以及其存在对于现代和未来社会的意义，使之在新时期更加鲜活、生动、充满活力地传承下去，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目前对于非遗保护，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非遗只有融入现代生活，形成适应当代社会的生存发展机制，才是真正得到保护和振兴。对于非遗的保护，就是要努力推动传统文化在自身文化生态系统中向现代性的转型与转换，延续非遗与人们生活的“共生”关系。

如何使其能够贴近现代生活、适应现代生活，在现代生活中找到合理的空间，学者们也给出了一些视角。如有人认为非遗项目的良性发展，一个有利的文化空间不可或缺，这类空间包括建筑、聚落空间、传统节日等文化空间；也有学者认为唤醒文化持有者的文化自觉，由他们自己来选择和确认文化的本真性与保护传承方式，才是非遗保护合理途径。因此要将非遗保护的社会工作与日常传承、展演区分开来，对于非遗保护社会工作应以政府为主导和主体，而日常传承和展演活动，则应该以民众为主体。再有就是对传承人及享有该文化遗产的

社区的重视和扶持等。这些对二十四节气的传承保护都具有指导意义，也为我们未来进行保护传承所采取的措施和方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二十四节气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是全体中国人的宝贵遗产，做好二十四节气的传承保护，使之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芒，是我们每个中国人光荣而艰巨的使命，需要我们每个人付出巨大的努力。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博物馆，本文转自《古今农业》2017年第2期）

践行“两学一做”，推行简办丧事，树立时代楷模

——记老共产党员石山为夫人力行节俭办丧事的先进事迹

胡兆荣

您见过把人民的利益看作超过自己生命的人吗？见过活着的时候为了人民、死了也要替他人着想的人吗？如果没有，就请你随着笔者的拙文，一同走进石山、王碧蕙夫妻俩，并走进他们人生的视野……

石山同志是我国著名的生态经济学专家。1936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地下党支部书记。1940年调赴延安，1942年赴晋绥解放区，1945年至1947年在东北解放区从事地方工作，1948年任昌图县县长。石山夫人王碧蕙，原为北京民族大学校长。离休后，从事民办教育事业，是民办教育的积极倡导人和实践者。2017年4月15日，石山同志的夫人王碧云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301医院逝世，享年91岁。

石山同志夫妇生活非常节俭，直到夫人王碧蕙去世前都没有雇保姆。离休时，部里曾给他配备专车，被其婉言谢绝，始终坚持不麻烦组织和他人的原则。这种严于律己的精神，赢得了人们的广泛赞誉。

夫人病逝后，石山同志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要求，以实际行动发挥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自觉践行殡葬改革，火化后实行生态安葬，保护环境，文明低碳祭扫，身体力行节俭办丧事，弘扬社会正气。

石山同志与夫人王碧蕙在生前就约定：死后丧事从简从速处理，不麻烦组织及他人，不发讣告，不设灵堂，不开追悼会，不办葬礼，死后火化不留骨灰，并得到孩子们的理解与支持。在处理后世过程中，家里仅通知了在京的部分亲友，外地的亲友一概不知。石山同志对此说到：“外地的亲友要来很麻烦，在得到消息后要来，年龄都很大，家属也要随着来，吃、住、行接待等，一场丧事办下来，忙坏了一家人，劳累了亲友，于心不忍。待过半年后，再告知外地亲友，这样做更为妥当。”

朴素的语言，展示了一个老共产党员高尚的情操和思想品质，令人赞叹不已……

王碧蕙生前和家人曾讲过多次，死后的丧葬费（5000 元）连带 40 个月抚恤金全部捐献，用于王碧蕙奖学金，献给她热爱的莘莘学子。

他们夫妇这种廉洁自律、艰苦朴素、克己奉公的作风还得要从他们夫妇各自的经历说起。

全国解放后，石山调入中共中央东北局办公厅农村研究组，从事全国农业方面的研究，1955 年调到谭震林副总理领导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农村组工作，1968 年文革中，被下放到农林部五七干校劳动至 1972 年。

1975 年开始，石山同志担任农林部政策研究室负责人，后历任中国科学院支农办主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现代化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1982 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顾问等，1995 年离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石山同志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我国农业建设和山区治理开发等方面的文章，引起了社会学界积极反响。20 世纪 80 年代，石山同志担任中国农学会副会长、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副会长，他根据我国人口、资源、环境国情等，积极倡导并推动用生态经济学的观点和系统工程理论建设发展现代立体生态农业，提出种草兴邦，植树造林，改善生态环境，开发山区、荒漠、滩涂、水面，践行大农业的理念；力倡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提高农民收入；倾心致力于老少边穷地区的农业综合开发，为农民脱贫奔走呼号，为我国农业现代化不懈努力，奉献了心血。

1995 年离休，年愈八旬的老人，始终被一桩未了的心愿纠结着，这就是我国黄土高原的治理建设与农民脱贫问题。看到一些地方水土流失依然严重，农民生活还很贫困，于是他多方收集整理资料，深入研究，著书立说，相继写出《中国山区开发与建设》、《大农业战略思考》、《实践与探索》、《恪守生态规律》、《报忧集》等著作，共约 150 多万字，受到中央与地方主管部门及社会各界的好评。目前，石山同志已过百岁，老骥伏枥，仍在不懈地思考贫困山区生态建设问题。

而夫人王碧蕙 28 岁考入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央民族大学任教，长达 47 年。抚育园丁的不解情结和苦旅般的追求，燃起她终身奉献教育的决心。1984 年离休后，亲自举办了北京民族大学，没花国家一分钱，从无到有，历尽 30 年艰辛，建立了这所民办大学。她做北京民族大学的校长做了 20 年，后来年纪大了，又做了 10 年的董事长。在她的耕耘和抚育下，该校已建设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现有 12 个学院，18 个系（科），40 个专业，1993 年被国家列为首批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试点院校；1997 年被成人教育协会民办高教委评为“民办高校先进单位”；1998 年被国家民委和北京市政府授予“民族团结模范单位”；2003 年荣获中国成人教育协会颁发的“诚信招生示范学校”；2004 年被中国教育网评为“北京市民满意的民办大学。”至此，王碧蕙个人荣获北京市民委颁发的“红烛杯”奖。2011 年王碧蕙奖学金基金设立，她拿出自己在北京民族大学的全部工资作为奖学金，奖励学习“状元”及贫困的学生，直到 2017 年离世。

王碧蕙校长长期从事高教事业，积累了大量教学及学术研究著作和资料，她是我国民办教育界公认的具有高度创新型民办教育家，她的著作和资料是教育领域、特别是我国民办教育事业的缩影，她的教学思想已对人们的教育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无需置疑，这种影响将会长久而深远……

石山、王碧蕙夫妇无私奉献，努力奋斗的一生，印证了夫妇俩具有坚定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其品质值得我们学习、其人格值得我们永远敬仰！当王校长离开人世后，又倡导节俭办丧事，为移风易俗带了个好头，树立起文明、薄葬、节俭办丧事的良好风尚，其博大的胸怀真是令人钦佩、其优秀的品质真是高山仰止、永远值得学习和借鉴！

（作者：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所长；素材组稿：辛梅、孙正恩）

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送：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 有关部委司局、各省农委（农业厅）、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各研究所
发：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各处、室、中心及下设机构

总 顾 问：卢继传 刘 坚

副 主 编：许小平

网 址：www.zhongguanyuan.com.cn

电 话：010-59195015 59195293

010-66117652 57206299

地 址：农业部北办公区16号楼、18号楼

部门协助：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推广培训处

主 编：胡兆荣

责任编辑：孙正恩 辛 梅

邮 编：100125

邮 箱：zgynjs@163.com

xxp1102@163.com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南3楼/4楼

责任人：黄维东



农业科学研究院



农业经济研究所